

1931年

第

卷

第

2

期

金貴銀賤之研究

一九三一年五月

中國經濟協會出版

布爾塞維克第四卷第二期

目次

目前政治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思 美

中國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的鬥爭

顧秋莫夫

第三時期的中國

澤 民

中國經濟的性質

伯 虎

關於「金貴銀賤」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幾個問題

澤 民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和機會主義的新活動

啓凡譯

目前政治形勢與我們的任務

思美

一

在世界經濟恐慌的背景上所展開的中國經濟恐慌，無疑的現在是更形深入了。工廠，礦山，各種企業與商店等的倒閉，還是經常的現象。中國工廠出賣給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移殖他們的資本到中國來的新聞，時常出現於報章雜誌上。金貴銀賤的困難，至今無法解決。農業經濟的恐慌，因農業產品價格在世界市場上的繼續低落，因軍閥官僚地主豪紳高利貸者的加緊剝削，因國內戰爭的繼續延長，因水災旱災的經常發生，而更加嚴重了。

工商業的恐慌的深入，使失業工人的數量空前的增加。資本家對於工人階級的進攻是一天一天利害了。工資因銀價低落，物價高漲的關係，無形中減低了百分之五十。工作時間實際上是比以前延長了。生產合理化的實現，大大的增加了勞動的強度，使工人的勞動條件比以前更形惡劣了。資本家用調通班等名義大批開除工人，已經變成了經常的現象。在農村方面，農村經濟的長期的恐慌，使整千整百萬的農民急速的破產。即以西北幾省而論，因為沒有飯吃而等着活活餓死的有六七千萬人！

一

在這種資本進攻的條件之下，中國工人運動的向上發展，是必不可免的事。自從去年紅五月之後，中國工人運動因為立三路線的實行而受到了相當的挫折，以至使一個偉大的工人運動的浪潮不能匯合起來而成為進攻統治階級的強大力量。但為時不久，這新的工人運動的浪潮又澎湃着衝擊前來了。在年關鬥爭中間，我們看到了工人運動新的發展。在北方唐山豐台等處鐵道工人和大沽鐵廠工人的鬥爭，天津四大紗廠的同盟罷工，電車電燈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的鬥爭以及最近自來水工人的怠工。在南方，無錫有四十五家絲廠參加罷工。在上海年關鬥爭中差不多很多大大小小的企業都參加鬥爭，而且很有些地方還得到了勝利。一般的說來，雖是大多數的鬥爭，現在還是自發的，散漫無組織的，經濟的，赤色工會的影響很薄弱，對於黃色領袖與社會局等還有相當的幻想，然而在目前工人鬥爭的形勢已經不是簡單的抵抗，而是在反攻中，具有進攻的形勢，而且在某些產業還具備了同盟罷工的可能條件（如像在絲業方面）。除了工人運動的新發展外，兵變潮流的擴大，實是目前革命形勢的新的指標。雖是兵變行動在去年一年內也有發生過很多次，但是像目前這種廣佈的，包括人數如此衆多的兵變，是從前所沒有過的。譬如在今年一月六日，陝西鳳翔地方發生三團人的兵變。二月二十七日山西臨安發生四團人的兵變。山西高平於三月內發生孫殿英部兩團人的兵變。安徽六安，第四十六師一團人，河南新十二師袁英部的兩團人，以及第

六十八師趙冠英一旅人，福建古屏余卓部兩連人的兵變等等。這些兵變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爲生活惡化，軍餉不發，厭惡戰爭，以及土地革命對於他們的影響而來的。

除了兵變潮流的高漲外，我們更看到紅槍會等的新的活動。中國農民羣衆，在地主軍閥官僚商人與高利貸的剝削下面，實在不能找到任何出路，於是不能不加入紅槍會等帶有宗教性的秘密組織，而相當的實行自衛。這種運動散佈最廣的，卽爲山東、直隸、河南數省。除紅槍會等外，土匪的數量更是不勝枚舉。

兵變數量的增加，紅槍會的活動，雖不完全表示出農民運動的發展，因爲在兵士與紅槍會內部，除了失業破產的農民之外，還有不少流氓無產階級的成份，但無疑義的，這些運動中間很明顯的表示出了農民要求出路的鬥爭。並且除了兵變數量的增加與紅槍會等的活動外，農民運動的發展，也是無疑的事實。在白色區域，農民抗租稅的鬥爭，真是不勝列舉。舉例來說，如像福建很多地方，農民反對煙苗捐以及割苗令等的鬥爭，河南四川等省很多農民自發的鬥爭，以及搶米等的騷動，往往與當地軍隊發生直接衝突。

目前革命運動的又一特點是江西吉安紅軍的大勝利，擊破了蔣介石第一次『圍剿』蘇區的計劃。現在京漢路上的紅軍的大勝利，已使蔣介石第二次『圍剿』蘇區的計劃，遭到了嚴重的打擊。這幾次紅軍的勝利，決不是偶然的事。不論取消派右派如何的

咒罵蘇維埃與紅軍，說他們是沒有羣衆的，說他們是土匪流寇，說他們在敵人攻擊之下必然消滅等等，蘇維埃與紅軍是已經發動了廣大的羣衆，是有千百萬工農的擁護，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紅軍與蘇維埃政府沒有廣大羣衆的擁護，他們在蔣介石幾十萬人數衆多，而軍械又精良的軍隊包圍之下，能夠維持到現在，而又能得到這樣大的勝利嗎？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光榮的一頁，這是中國革命目前最主要的一個特點。

當然，在蘇維埃區域中，我們絕不否認，我們所有的一切弱點。最主要的是我們的鄉村中間的富農路線，我們還沒有把廣大的工農羣衆完全組織起來，蘇維埃尙還不是廣大工農羣衆的政權，紅軍的成份尙還缺乏工人的骨格，而且黨的力量還是很薄弱。但是這些弱點，並不足以否認蘇維埃與紅軍所有的偉大的成績，並不足以否認蘇維埃與紅軍是中國工農政權與中國工農的階級軍隊。

當然，在中國革命高漲的形勢之下，白色區域內工農兵運動的發展，紅色區域內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與鞏固，都是非常不平衡的。工人運動雖是現在又在開始發展，但他同全國的農民運動比較起來還是落後的。農民運動與兵士運動的發展，在各地也是不平衡的。河南安徽福建江西等省較之江蘇浙江等省，無疑的是比較的發展。在蘇維埃區域內發展與鞏固的程度也是不一樣的。鄂豫皖的蘇區有很大的發展與勝利。

江西衝破了敵人第一次的『圍剿』。但是鄂西與閩西是遭到了部份的失敗。

一一

中國革命運動的新的發展的局面，當然必然引起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以及一切反革命份子的恐怖，仇視與加緊的進攻。在目前政治形勢中間，我們所應該抓住的一個最主要的關鍵，就是反革命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死命的進攻。反革命與革命兩方面的主要策略，都是依靠於這關鍵而旋轉的。

自從蔣介石『平定』馮閻，中國在表面上似乎統一之後，反革命的主要策略，就是在用所有的一切力量先來消滅蘇維埃與紅軍。去年國民黨的四中全會決定了兩件最主要的事，就是消滅『共匪』（現在改名為『紅匪』）與召集國民會議。實際上，這兩件事是一個東西的兩面。國民會議的召集，固然表示出蔣介石利用這東西來反對其他軍閥，來牽制其他軍閥的企圖，但主要的，是南京政府想借此來同蘇維埃對立，來團結一部份反革命力量，來欺騙一部份小資產階級與工農羣衆。簡單的說來，國民會議的旗幟是蔣介石用得來進攻蘇維埃區域與紅軍的。

除了國民會議之外，蔣介石還利用了什麼工會法工廠法，在一些欺騙的詞句之下，向中國的工人階級進攻，以此來取媚於帝國主義者與資產階級，並以此來『平靜』他的後

方。白色恐怖，在全中國現在是比從前更利害了。絲毫的對於南京政府的不滿意，立刻遭到南京政府軍閥的嚴重的壓迫。就是一切關於『剿匪』的實際消息，現在也不能登載了。因為在這時候，任何失利的消息的傳出，對於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的欺騙宣傳，都是很大的打擊。任何的工人的鬥爭的發生，對於他都是很大的威脅。但是在他們這種屠殺壓迫政策的底下，並不能阻止他們提出什麼約法問題，來拉攏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來塞住胡適新月派的要求約法的臭口。此外，他還舉行了什麼絲業借款航業借款等，一方面來彌補他自己破產了的財政，一方面來『幫助』民族工業的維持。

對於帝國主義方面，蔣介石爲了要借一筆大借款以解決他目前財政上的困難，以進攻蘇區與紅軍，更進一步的投降了。代表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近來對於英日也表示了向所未有的馴良態度。他很快的解決了滬案與漢案，他在電信、航運、工業方面允許了英日資本家以很多的讓步。近來在南京政府外債整理委員會上，正討論着如何來給各國過去無擔保的借款以擔保。幾萬萬西原借款的償還，在原則上已經不成問題，現在爭論的祇是償還時的數目而已。現在爲了大借款的進行，不論這借款是金的或是銀的，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在準備着新的大出賣。正預備把全中國所有的鐵路，所有的富源，交到外國帝國主義的手裏，爲的是要消滅『共匪』，以維持他的運命。

對於各軍閥方面，對於北方的張學良以及西北馮閥的舊部，蔣介石極力採取收買與

拉攏的手段，甚至在有些地方，不能不表示讓步。對於廣東廣西等省許多廣東派，西山派以及桂系的許多軍閥，他使用威嚇與利誘的方法，破壞他們內部的團結，使他們西南各派軍閥反蔣的大聯合變為不可能。他的主要的策略，也同樣是在盡力和緩軍閥內部的衝突與矛盾，來進攻蘇維埃與紅軍。

雖是這樣，雖是蔣介石利用一切方法來和緩反革命內部的矛盾的發展與爆發。但是反革命內部不能和緩的矛盾，還是很明顯的表示了出來。胡漢民與蔣介石的衝突，黃紹雄與陳濟棠的衝突，四川各軍閥中間已經開始了的戰爭，雲南雲龍的下野，爲了財政，爲了編遣，在南京與張學良間所發生的暗潮，甚至在「剿共」軍內部何健與何成濬等的鬥爭……，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事。

此外，南京政府的財政的恐慌，使得他除了加緊剝削工農以外，不能不想盡一切方法，來搜刮金錢。他甚至主張鴉片公賣來刮一筆大錢。他的裁釐加稅政策，實際上變成了加釐加稅。統稅，特稅，營業稅，運輸稅，出口稅，很多很多的名目，中國工業與農業不但得不到什麼保護，而且受到很大的打擊。對於這樣繁重的稅則，就是中小工業資本家與商人也表示出不滿，至於大多數貧苦的消費者更不要說了。因爲稅收的加重，就是商品價格的昂貴，商品價格的昂貴，就是購買者的減少，就是『生意蕭條』，結果就不得不閉門歇業。在青島無錫等地，一般工業資本家與商人，因爲火車運費

加價百分之二十，發生過罷運的『風潮』。當然，這一切並不足以阻止南京政府『振興實業』的廣大的宣傳！

立刻取得大借款的企圖，因為英美的衝突，一時也不能實現，雖是小的，幾千萬的借款，差不多是天天成交的。帝國主義者決不能像『孫總理』蔣介石所想像的那麼簡單，肯決然『肅除一切成見』，把他們的資本借給蔣介石。大借款的實現，我們知道是有可能的，因為帝國主義者同蔣介石一樣的希望早日『肅清共匪』，使他們能安心的剝削中國的工農民衆，但必須要經過一個相當曲折的時期，經過帝國主義內部的『協商』，與蔣介石的買價。在蔣介石方面，雖是縮頭做烏龜都願意，但是帝國主義者內部絕不能一時妥協起來，而且他們也想利用蔣介石的困難來做一點投機生意，以便取得更多的代價。

可見，雖是蔣介石用盡一切力量，團結反革命的內部來進攻蘇區與紅軍，但是反動營壘中間，實潛伏着很多的危機。祇是因為統治階級對於革命的恐怖與仇恨，使他們內部暫時團結起來，來實行幾個月內『肅清共匪』的工作。

帝國主義者國民黨用了這樣大的力量，第一次調動了二十五師的軍隊進攻蘇維埃與紅軍，並且蔣介石限定在三個月之內完結這工作。但是結果怎樣呢？結果蔣介石是失敗了。英勇的紅軍與革命的工農羣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擊退了國民黨的進攻

，解除了他們一部份的武裝，俘虜了張輝瓚等。紅軍在這一次勝利中間，反擴大了他的武裝，與戰鬥的經驗。

這失敗在帝國主義者與中國反動階級的內部引起了更大的恐怖與仇恨。像一隻喋血的瘋狗似的，蔣介石現在又動員他所有的補充力量，定出了他們第二次進攻蘇維埃與紅軍的新計劃。這一計劃比較從前的是更加利害，更加殘酷，更加血腥的。他現在更大規模的使用了毒瓦斯，更殘酷的屠殺着當地貧苦的工農羣衆，以免去他們再受到革命的影響，更有計劃的來封鎖蘇區，以使用飢餓的手去扼住他們的喉嚨，強迫他們降服，他們更用盡一切力量來幫助蘇區內所有反革命的力量，如像改組派，第三黨，取消派以及地主富農等舉行反革命的暴動，並竭力組織民團，在蘇區內實行游擊戰爭，用這些方法來搗亂我們的內部。他們更用挑撥離間造謠等方法，來破壞我們的內部，如最近關於彭黃的叛變，反對毛澤東的鬥爭等的謠言等等。

但是，這第二次的進攻能夠勝利嗎？

平漢線上英勇的紅軍又擊敗了白軍的進攻，活捉了岳維峻！這一部分已經回答了帝國主義國民黨能否勝利的問題。

在反革命營壘中間，除了以武力屠殺民衆，以血與鐵來鎮壓一切革命運動的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外，還有一支比較更危險的軍隊，用反對蔣介石包辦的國民會議，主張『真·正·民·衆』的國民會議的方法來欺騙民衆，向蘇維埃進攻。這就是改組派，第三黨，人權派。托陳取消派與右派叛徒！

你主張國民會議，我是反對國民會議，現在已經變成了革命與反革命的分水線。拿國民會議做帽子，在反革命營壘中團結所有對南京政府立於反對派地位的一切反革命力量，實是目前政治形勢中一個主要的特點。

改組派自從同閻馮兩大帥一場春夢醒了之後，暫時的銷聲匿跡了下去。雖是他在蘇維埃區域內積極的組織着內部的反革命暴動，準備以此來推翻蘇維埃政權與破壞紅軍。現在當全國革命運動有了新的發展，反革命統治發生了新的動搖，蘇維埃與紅軍得到很大的勝利時，改組派又起來開始他們的反蔣論調了。他們甚至起來反對蔣介石的國民會議，像煞有介事的主張甚麼總理的真正國民會議！

改組派的這種欺騙，我們在二年以前當改組派大出風頭的時候，曾經指出：這個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改組派這樣大吹大擂的叫喊，反對蔣介石，並不是爲了要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是爲了要維持這統治。過去的歷史告訴過我們，那時的結論是完全正確的。目前的形勢又使改組派感到有起來反對蔣介石，維持統治階級統治地位

的必要。改組派的領袖汪精衛近來在『總理逝世紀念告同志書』一篇文章上寫道：

『南京當局，已做成了本身崩潰的趨勢，而反黨的軍事形勢潛在於北方，共產黨猖獗於江西，又都在南京政府當局孕育之下發榮滋長起來。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局面之下，我們於檢查過去一年工作之後，仍然繼續的提出工作的總標準：樹立民主政治，推倒個人獨裁』。（見三月十二日『華東日報』）

改組派反對南京政府的蔣介石的獨裁，爲的要救濟反動統治於滅亡，爲的要更利害的進攻革命運動，更快的消滅蘇維埃與紅軍，沒有像汪精衛自己說明的再明顯了。他的甚麼真正的國民會議的宣傳，除了用來反對蔣介石的獨裁以外，主要的是在反對真正代表工農兵利益的蘇維埃，是在欺騙與誘惑一部分小資產階級與工農羣衆，使他們落在改組派的反革命的圈套中而爲改組派所利用。

同改組派的政綱大同小異的，即爲第三黨，第三黨近來也大施活動，宣傳他們的勞動羣衆的國民會議。第三黨實際上不過是改組派的左翼，是改組派失敗之後的候補者。他們的反革命作用，他們的危險，是同改組派沒有甚麼分別的。主張甚麼勞動羣衆的國民會議的第三黨，他們在福建屠殺工農的成績，他們在蘇區組織反對真正代表勞動羣衆利益的蘇維埃，舉行反革命的暴動等等，難道還不足以表示出他們反革命的眞面目嗎？

不論是改組派或是第三黨，他們除了依靠另一個或另一羣軍閥之外，就不能有其他的力量來推倒蔣介石的獨裁。過去改組派投身馮閻兩個大軍閥的門下，當他們的姨太太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了。現在他們又玩這一套把戲，又捲土重來拉攏南方各大軍閥，北方張小帥，以組成反蔣的大聯合做倒蔣的運動。那時他們的『真正國民會議』，當然是李記張記陳記的國民會議，同蔣記的國民會議決不會有甚麼區別！現在改組派等所組織的『國民會議國民自決會』，實際上是上海野雞拉客人到家裏去過夜的迷人的媚眼。這些客人（當然也是汪精衛的『國民』）當然就是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張學良，以及馮閻等老相好！

改組派的這些把戲已經玩的令人惡心了，但是他們還是一次兩次的玩，爲的是要反對革命運動，反對蘇維埃，欺騙民衆，以鞏固動搖着的反動的統治。

至於那些『左』到比托洛斯基主義再不能左的『革命的』托陳取消派呢？那我們可以看下面的一段話：

『國民黨的國民會議是假冒名義的國民會議，換言之，即假冒人民名義的一黨一派的分職會議……真正的國民會議，只有無記名普選的』。（『我們的話』二十二期政治通告第四號）

無記名普選的國民會議，就不是一黨一派的分職會議，就是考茨基的『純粹的德謨

克拉西』，這當然是『左』派的真正老牌的『革命理論』，但這對於我們不是重要的。對於我們重要的就是陳獨秀主義者與托洛斯基主義者曾經是主張參加這個『一黨一派的分職會議』的。這是百分之一百的托洛斯基主義者，托洛斯基先生曾經在他給中國托洛斯基主義者的信上所發的一大篇言論的中心點！

但是革命的形勢發展，和改組派第三黨的宣傳，教育了中國的取消派使他們不能不更變他們的理論，使他們『左』傾。他們現在也同改組派第三黨一樣，反對蔣記的國民會議，要求真正的國民會議了。他們現在竟這樣說：

『在目下國民黨武力統治下，要召集一個全權普選的國民會議是不可能的……召集國民會議的先決條件，必須恢復一切政黨的自由，停止警察與軍人對政治的干涉』。（同上）

這幾句話，如若在下面沒有『我們的話』的署名，那就一定要說是改組派第三黨與胡適之人權派的偉論。在國民黨統治下要求『一切政黨的自由』，『停止警察與軍人對於政治的干涉』，真是白天做夢！但如若蔣介石稍為聰明一點，那允許『反對派』取消派的自由，實際上也未嘗不可，因為這對於蔣介石祇有好處，沒有壞處的。

可見托陳取消派的主張同改組派第三黨以及人權派的主張，根本上實際沒有甚麼不同的地方。所以他們公開的主張相互間的聯合，以進行他們反蘇維埃與共產黨的工作

。在同一種文件內，他們寫道：

一四

『在目前的階段內，即是說在國民黨以國民會議相號召的一個短期間內，力爭政黨政治的自由，與人民普選是行動的中心口號。在進行這種民主鬥爭時，可以與資產階級的左派，如改組派，第三黨，人權派等作事務上的聯絡，如組織宣傳國民會議的演講會，組織人民自動的選舉會等』。（同上）

在政治上已經有同樣的觀點，當然在事務上也必須聯絡了。這反革命的出路，實是「左」的托陳取消派必然要走的，而且是走了的。

除了「左」對反革命的托陳取消派外，還有一支新的反革命的部隊，那就是以羅章龍為領導的右派。這右派在反革命中間現在已經盡了很大的作用。它除了在理論上否認中國革命的高漲，反對蘇維埃與紅軍，反對中國工人運動的罷工鬥爭，反對中國共產黨以外，更在實際上做反蘇維埃與紅軍，反工人運動，反共產黨等的鬥爭。這些叛徒們，實際上現在所做的是工賊，偵探等所做的工作。他們幫助國民黨破壞我們的黨部，屠殺我們的同志，甚至用綁票方法向我們同志敲竹槓！他們設法鑽到紅軍裏面去，幫助蔣介石分裂紅軍的內部。……難道還要其他的證據，來證明右派的反革命嗎？

這些派別，實是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維埃與紅軍中所有的反革命的尾巴。他們用對蔣介石取反對派的方式，來欺騙民衆，來擁護國民會議，來進攻蘇維埃與紅軍。

我重複的說，這些派別是在反革命營壘中比較更危險的派別。

四

從上面的這許多分析中間，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黨的中心任務是維護蘇維埃與紅軍。我們黨在蘇區內必須用最大的力量，消滅立三主義下而所發榮滋長出來的右傾的危險與立三主義的『左』傾，執行國際與四中全會所給予我們的指示。祇有澈底反對帝國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執行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的土地法令，勞動法令，經濟政策，關於紅軍的決議，發展游擊戰爭，組織赤色工會，僱農工會，苦力工會，貧農團，真正由廣大的工農兵產生的蘇維埃政府，與有工人骨幹的紅軍，發動千百萬的工農羣衆起來爲了集中蘇維埃政權，爲了蘇維埃中央政府而鬥爭，肅清一切反革命的A B團，改組派，新共黨，第三黨的勢力，堅決執行反對富農的路線，鞏固與發展我們的黨與團的組織，我們才能衝破蔣介石的第二次『圍剿』，鞏固與擴大我們的蘇維埃與紅軍。

在非蘇區方面，我們也同樣的要和李立三主義的『左』傾，與在『左』的掩蓋之下的右傾的頹喪與消極鬥爭，我們必須反對對於中國工人運動過高的左的估計，與過低的右的估計。必須同忽略目前擁護蘇維埃與紅軍的中心任務，看輕反帝的鬥爭，對於目前的形勢表示悲觀失望，懼怕擴大鬥爭的心理，在實際工作中消極怠工，忽略兵運與農運，

忽略游擊戰爭的傾向等等，做堅決的鬥爭。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指導工人的日常鬥爭，使這些鬥爭從散漫無組織的變為有組織的，從經濟的變為政治的，從一廠的變為一業的鬥爭，並擴大這些鬥爭到廣大的示威與罷工的運動。必須用很大的力量去反對國民黨，改組派，第三黨，人權派，托陳取消派與右派的反革命的宣傳，尤其是關於國民會議的宣傳，揭破他們的反革命的面目，與他們在蘇維埃區域內所做的反革命的實際行動！

自從在四中全會上，國際路線戰勝立三路線之後，我們的黨在很多工作上，已經開始了轉變。在目前這一階段，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在堅決的反對被立三路線的左所遮蓋着的對於實際工作的消極與怠工。共產國際的路線，在思想上已經給與了立三路線以致命的打擊。現在在我們黨內差不多誰也不敢再出來反對國際路線，說這路線是不適用於中國的了。但是承認這路線的正確是一件事，在實際工作中執行這一路線又是一件事。在我們黨內，我們還看到不少同志，雖是在口頭上承認了國際路線與四中全會的路線的正確，但是對於國際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執行却是怠工的。堅決肅清兩派，反對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實是我們黨在兩條戰線的鬥爭中的最主要的任務之一。

其次，要在實際工作中真能執行國際路線，我們必須堅決的肅清過去立三時代的工作方式的殘餘。那些對國際路線的執行怠工的人不必說了，就是那些真正爲了國際路

線的執行而鬥爭，非常忠實於黨的同志，在實際工作中往往因為太急於要求獲得很大的成績，因為不能澈底了解依靠羣衆，經過羣衆的工作方法，不能完全了解黨與羣衆團體相互間的關係，不自覺的露出了立三主義的狐狸尾巴。這種例子，我們可以舉的很多。比如，最近在很多鬥爭中，我們同志因為不能澈底了解輔助組織和赤色小組的區別，以至破壞了輔助組織。在工人羣衆中日常的經濟鬥爭，我們機械的把擁護蘇維埃和擁護紅軍的口號同工人經濟的要求並列起來，以至破壞了經濟鬥爭。行動委員會的組織，還是用指定自己同志來組織的方式，而不經過羣衆的路線。徵調工人到紅軍去，不能完全免去招兵買馬的舊調。一切這些殘餘，都是我們黨完成目前奪取千百萬工農羣衆的中心任務的障礙物。

最後，我們現在必須找出種種新的工作方法，真正來發動羣衆和組織羣衆的鬥爭。必須盡量應用各國共產黨，尤其是蘇聯共產黨的經驗，到中國來。黨的領導機關必須找出種種新的工作方法和經驗，介紹給於全黨的幹部。同時必須盡量發展下層幹部的創造性，使他們能自動地用各種各樣的新的方法去接近羣衆。新的工作方法的取得，單是靠領導的力量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多多的相信階級的創造力，並且用種種方法去把它發展出來。只有這樣，才能拿新的工作方法去代替舊的，立三主義的工作方法殘餘才能從我們黨的中間完全肅清出去。

發展黨內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實是啓發黨員羣衆創造力的一種最好的方法。

在立三主義統治的時候，沒有黨內的自我批評，一切都是命令的，官僚主義化的，所以一切下層黨員羣衆的創造力也就完全抹殺了。反對立三主義，必然要堅決反對這種對於自我批評的壓制，反對那些只以爲自己是知道了一切的工作方式而不相信羣衆創造力的指導者。

革命競賽和衝擊隊等的方法，必須更廣泛的應用出去。這會引起同志對於自己所擔負的工作的責任心，會推動他們自動地想出種種方法去實行他們同其他組織所訂立的條件。革命的熱情是我們所必要的，這熱情會幫助我們找到組織羣衆，領導羣衆的新出路。

在全黨像一個人一樣，用革命的熱情，澈底的實行兩條戰線的鬥爭以執行國際的路線時，我們堅決的相信，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一九三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中國共產黨之布爾塞維克化的鬥爭

顧秋莫夫

『在人口異常衆多，社會條件異常特殊的東方各國裏，將來的革命，無疑的要表現出一種比俄國革命更加厲害的特殊之點來：關於這一點，完全是歐洲的市僧們所夢想不到的，不消說，模仿考茨基而寫的那一種教本，在過去一個時期中是一種很有益處的東西，有人曾經這樣想：這一種教本，已經預察到今後世界歷史發展過程中所有的形式，現在，已經是埋葬這一種意見的時候了。誰如果還要這樣設想的話，那我們把這種人叫作十足的傻子，這是非常適合時宜的了。』（列甫：論俄國革命。見列甫全集第十八卷，第二編第一百二十頁）

(一)

中國革命含有許多極大的特點；因為有這些特點，所以牠不僅和西歐各國革命不同，而且就是和俄國革命比較起來也是很不一致的。在一九〇五年的時期，俄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條件之下進行了自己的鬥爭，爲的是要奪得工農民主的專政。

這種民主的專政，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的環境之下（由於許多條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各階級各政黨對於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實現了。這種民主專政存在的時期是十分短促的，而且是在一種特殊的「妥協的」偏狹的形式之下實現的，在兩重政權形式之下，在工農代表蘇維埃（甘願把政權讓給資產階級的蘇維埃）與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合作的形式之下實現的。

一直到社會主義革命的環境之下，俄國無產階級纔附帶地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徹底解決。

中國現時革命的行程便不是如此。

工農民主的專政在蘇維埃形式之下存在着，增長着，發展着，牠正在自己的廣域之下收集成千百萬勞動的羣衆，使同時存在於非蘇維埃區域的，還很強大的（主要的是由於帝國主義之幫助），殺人無厭的地主資產階級的專政，不得不胆戰心驚，坐臥不甯。

對於這一個不斷發展的工農專政，足以左右一切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之正確的解決，而解決這一問題的前提，就必須由無產階級握住農民運動裏面領導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曾經領導農民運動，來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平均重分一切的土地，中國共產黨將能擴展革命的鬥爭，將能發動幾千萬幾萬萬（不僅幾百萬，好似現在二樣）農民羣衆，不僅發動，而且在鬥爭中間把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去爭取土地，反

對國民黨，反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和地主，——這樣一來，中國革命偉大的勝利便有完全的保證了。

要知道：正確的解決土地與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問題，乃是解決中國革命目前這一整個的，比較長期的階段（中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民主的階段）之全般任務的關鍵；而中國革命目前的形式，以及新的革命運動高漲過程中的許多困難，又在中國共產黨及無產階級前而提出了許多特別重要的組織的政治的任務，而這些任務，又把無產階級目前領導反帝國主義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務，具體化了。

在中共領導之下的新的革命高漲，已經獲得了許多重大的成績：蘇維埃政權已擴展到包含有四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已增加到十萬人以上；罷工運動正在向前發展，就罷工人數來說，中國罷工運動已居世界第一了。只有無產階級底仇敵或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才能抹殺羣衆運動這一些重大的成績，才能抹殺中國共產黨這一些重大的成績。

可是，在目前的中國，還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蘇維埃政府，還沒有一個足以在全國範圍內領導武裝鬥爭以反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而又能在自己統治的區域裏徹底實行各種革命設施的蘇維埃政府，同時，中國紅軍，雖然正在發展與鞏固；可是，還有許多的弱點，還保存有許多農民游擊隊伍和軍閥僱傭軍隊底遺跡。中國的紅軍還沒有力量去向國民黨（更不用說帝國主義了）作一個最後的決戰。

其次，革命運動之發展，也是很不平衡的。南方各省已經充滿了農民戰爭的火焰；而北方的農民，却還沒有發動起來，而且，還有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工業中心裏面的工人運動，還很厲害地落在農民運動現有的規模之後，現在時局底特點，就是羣衆運動真正達到暴動程度的還只有單個的區域，在這些區域裏面，羣衆運動已經在共產黨正確領導之下取得了勝利，已經開始建設革命的軍隊和政府；可是，牠還不能給國民黨與帝國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因此，在目前，我們這處在一個比較大的，「橫在國內戰爭總過程各個偉大戰爭之間」（列甫底話）的間隔裏面。

列甫在預察一九〇五年革命發展前途時所說的話，很可以應用到中國現有的環境上而來。列甫當時寫道：

『武裝暴動之採取更高度的更複雜的形式，武裝暴動之變爲長期的，籠括全國的國內戰爭，即兩部分人民之間的武裝鬥爭，這是完全必然而不可避免的。』

這個國內戰爭，必然是這樣一種過程：經過幾次大戰爭之後，就要經過一個比較長時間的間隔，然後又開始一種新的大戰爭，並照這一種方式發展下去；同時，在這種比較長時間的間隔裏面，又要發生許多小小的戰爭。既然是這樣——而且無疑義地是這樣，那社會民主黨（這是列甫在一九〇六年寫的。顧秋莫夫註）就要努力造成這樣的組織，能夠最高限度地領導羣衆作這些巨大的戰爭，而且又能儘可能

地領導羣衆作這些小小戰爭的組織。」

這種能夠最高限度地領導羣衆進行巨大戰爭與細小戰爭的組織究竟是什麼呢？關於這一個問題，列甯在更早以前就回答過了。當俄國革命剛開始達到「民衆暴動最後發展階段」——組織革命軍隊的時候，列甯就說了以下的話：

「由這種隊伍（即指革命軍隊。顧秋莫夫註）來號召暴動，來給羣衆以軍事的指導；這一種工作對於國內戰爭（也如對於其他戰爭一樣），乃是必需的，這種隊伍更造成公開的全國鬥爭底支柱，將武裝暴動散布到隣近其他各區域裏面去；保證——首先也許只在國內不大的一個區域裏——十足的政治自由；開始用革命手段改造陳腐的專制的制度，儘量發展下層民衆底革命創造力量；他們在和平時期是很少機會表現這種創造力量的。革命軍隊只有認識了這些新的任務之後，只有很勇敢地將他們儘量提出之後，牠才能夠獲得完全的勝利，而成爲革命政府底柱石。在民衆暴動目前這一階段，革命政府同樣是一個迫切需要的東西，正如革命軍隊一樣」（節錄列甯所著的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列甯全集第七卷第三八四頁）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這一個前途（就算在國內不大的一個區域裏，組織革命的軍隊與革命的政府）是沒有實現的；革命政府是沒有組織起來；而革命軍隊也沒有存在多久，而且牠所有的規模也是很小的。

可是，在現時的中國，情形却不是如此。在中國，存在有革命的軍隊及蘇維埃政權根據地，而這種根據地又在不斷地發生與發展，共產黨員正是根據這種事實來決定共產黨目前的任務。

中國所有各種重要的特點：全國分成許多帝國主義勢力的範圍，封建式分裂的狀態，中國反革命勢力沒有統一集中的政權，國內各地革命形勢成熟之不平衡，末了，中國疆域之廣大與人口之衆多，——所有這些，都是決定中國革命之特殊發展道路，特殊鬥爭形式與方法的因素，使其不同於其他各國的（例如西歐的）革命。

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革命這一些特點，根據擺在革命前面的各種困難，以及羣衆運動所已經得到的成績，便提出了下列的任務：

（一）組織常備的，紀律化的，工農的（就其成分來說），共產黨的（就其領導來說）紅軍。這個紅軍，必須在革命的蘇維埃區域裏面建立自己的強固的根據地。

（二）組織強有力的蘇維埃政府，這個政府，必須要能夠在自己所屬各區域裏面，澈底實行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底各個基本的口號，必須以自己的行動來聯合與動員中國勞動的羣衆，使其去對國民黨及帝國主義進行堅決的鬥爭；

（三）在一切大的工業中心裏面，向前發展無產階級局部的經濟的鬥爭，更加緊使這些鬥爭革命化，將無產階級這些鬥爭與一般的政治任務聯繫起來，就是說，使其擁護蘇

維埃區域的鬥爭，爲達到蘇維埃政權（工農民主專政形式）底勝利而鬥爭，聯繫起來。這是三位一體的任務，這是一個總的任務，把這一個任務實現出來，就可以使中國革命很有成效地發展前去；就可以使羣衆運動，使無產階級領導權所鞏固起來的羣衆運動，使無產階級經過國家政權而實現的領導權所鞏固起來的羣衆運動（紅軍及蘇維埃政府，都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得到一種極偉大的發展；就可以保證中國工農羣衆在國內戰爭之大決戰中，得到完全的勝利，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及帝國主義的統治。

(二)

反革命的托洛斯基派與被共產黨驅逐出去的陳獨秀派，爲要反對共產黨的總路線，相互之間已經結成聯合的戰線，企圖破壞中國工人與勞動農民羣衆日益發展的進攻。在他們中間，因各人嗜好與心理之不同，也有人照舊拿着虛偽的「左派」辭句作護符；而另一部分人，則簡直把這些早成爲廢物一錢不值的辭句，完全拋棄了。

虛偽的，欺人的，「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的」辭句，其唯一的任務，就是掩蔽托洛斯基派及右的取消派之間一致的反革命的口號——召集軍閥式的「立憲會議」——全權的「國民會議」（托洛斯基底話）的口號；他們這一個要求，是完全反革命的；反革命勢力（國民黨最近中央全會），已經利用牠來反對工農革命紅軍及蘇維埃政權唯一革命的（

在目前環境之下）口號了。

在目前殘酷的國內戰爭的環境之下，在蔣介石進攻紅軍與蘇維埃區域的環境之下，誰提出這種反革命的主張，企圖轉移革命羣衆底視線，企圖使革命羣衆不去擁護自己的政權和自己的軍隊，却使其反轉來走入「和平」「合法」鬥爭的邪途，使其停留在還未實現，可是早已反革命達於極點的，軍閥式的，劊子手的混血的「國會」範圍之內，誰提出這樣的主張，誰就是工農羣衆之公開的生死仇敵，這一點，已經是每一個革命無產者所完全明白了的。

中國先進的工農，正在向國民黨政權及蔣介石軍隊進行革命戰爭的工農，已經知道托洛斯基下面的說法，完全是反革命的，專門拿來欺騙民衆的說法。

『在目前，誰如果把蘇維埃口號看作迫切的口號，誰就是冒險主義者，空談家。反對軍事專政的鬥爭，必須採取一種過渡的形式，必須提出一種過渡的革命民主的要求，而這些要求又可以歸結成爲一個總的要求，即召集中國的立憲會議，這個立憲會議必須根據普遍的，平等的，不記名的，直接選舉制產生之，其目的就是解決中國目前各個重大的問題：施行八小時工作日，沒收土地，保證民族之獨立……。』

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革命羣衆，正在爭取自己的蘇維埃的政權，建立自己工農革命

的紅軍，分配土地，設立革命的法庭以殺戮反動的奸細。在蘇維埃政權區域裏，革命羣衆之創造的發動性，一天一天發揚出來了，羣衆的犧牲精神與革命的熱情，一天一天增長起來了，朱毛紅軍鬥爭的歷史，幾百萬『少年先鋒隊』及工農自衛隊鬥爭底歷史，是一段非常英勇的，非常忠於革命的歷史。

當革命熱情這樣沸騰的時候，反革命的取消派，却企圖掩蔽在虛偽的『社會主義的』『不斷革命的』辭句下面，引誘工農來出賣這一種猛烈的，成績卓著的（這一點特別重）鬥爭，引誘他們去要求國民黨式的『全權的國民會議』，等待牠來施行八小時工作制，解決土地問題與『保證民族之獨立』！

在這一個共同的反蘇維埃政權，反紅軍的政綱上面，中國右派的領袖——從共產黨開除出去的陳獨秀之和托洛斯基打成一片，陳獨秀之很快接受不斷革命的口號——一點革命氣味也沒有的口號，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現時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建設條件之下，半托洛斯基主義者與右派（雖然兩者底綱領，還稍許有一些差別），都是反映一部分小資產階級底動搖——傾向於使蘇聯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使蘇聯走上資產階級復辟的道路。在另一種條件之下，即在革命的中國，托洛斯基派與陳獨秀派也是共同執行資產階級底意旨：根本破壞工農革命的運動，幫助反革命來破壞與消滅新的革命政權與革命軍隊底萌芽——尚未鞏固的，年

青的，但已經很強大的，生氣勃勃的萌芽。

因此，向托洛斯基主義及陳獨秀主義作毫不調和的鬥爭，是共產黨向前發展，領導羣衆，以取得勝利的必要的條件。

(三)

因爲中國革命高漲及其全部國際及國內環境有許多特殊之特點，所以共產黨員必須要有非常嚴格的紀律性，無產階級的堅定性及組織性；奮不顧身的革命勇氣，同時又要慎重地估計到自己的力量及敵人底力量，要用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將這兩種特性配合起來。

現在，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用無產階級底方法，應用無產階級一切組織上的力量，來解決資產階級民主的、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底任務。

要使革命高漲得到更進一步的、左右一切的勝利，就必須解決下列幾個最大的組織的政治的任務：從半游擊隊伍來組織工農常備的紅軍（在農民游擊運動向前發展的條件之下）；同時，並建立革命的蘇維埃的根據地，以圖向前收集與團結革命的力量；向前發展工人罷工的鬥爭，只有這種鬥爭，才能使革命運動擴展於全國，才能鞏固無產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領導權。

單靠革命的狂熱，短時期的革命衝動，是不能解決這些任務的。無產階級的紀律性，堅定性，堅忍性，組織性——這就是目前把革命運動推進到更高階段所絕對必要的性格。恰巧就在這種新的，要轉變到提出與解決中國革命新任務的條件之下，在中國共產黨一部分領導工作同志（以李立三同志爲首）中，便暴露出一種動搖來；這部分同志并因此而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路線——實際上便是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而且是冒險主義的路線，這路線是完全仇視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底路線的。這部分以李立三同志爲首的領導工作同志，完全脫離了革命的工農羣衆，甚至於連一次也沒有到過英勇的反國民黨的鬥爭最劇烈發展的區域，更不必說蘇維埃區域了。李立三同志只是一味地從事於紙上談兵的勾當，專門坐在屋子裏起草『革命的』通告，論文，『最革命的』必遭失敗的計劃；結果，他就和共產國際劇烈衝突起來；同樣也就和自己的黨劇烈衝突起來；而他那種想把自己的黨拉來反對共產國際的企圖，也就遭受了可憐的失敗。在一九一八年時期（與中國現時局面完全不同），列甫在蘇俄給『左派』的所下的估計，很可以拿來估計李立三同志所領導的這一部分同志底情緒。

『我們的『左派』，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的黨的紀律及其準備，他們遍身都充滿了失掉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心理。』（列甫：論『左派』幼稚病與小資產階級）

當這些知識分子的「上層分子」與上層分子兒」反對這些偉大的領導中國革命的政治的組織的任務時，在中共領導之下的工人及被剝削的農民羣衆——恰巧就是這些羣衆，却能在實際上，在實際革命工作中，一天一天地，布爾塞維克式地，平民式地（而不是政客式地）解決土地的問題，解決自己的工農軍隊與工農政權的問題。

還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實，就是當聯共裏面「左」右派聯盟（洛明那慈與瘦草夫）正在用兩面主義的方法，來反對聯共總路線的時候，在中國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洛明那慈同志底學生——瞿秋白同志，在中共三中全會上面，以口頭上承認「單個策略上組織上錯誤」的方法，極無原則地掩蓋了分歧底實質，把半托洛斯基主義的、還未揭露出來的李立三路線，和黨內及李立三政綱內許多極端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都掩蓋了起來。因此，在這一個時候，斯大林同志不久以前在另一環境與對另一種任務所下的估計，便很適宜於拿來分析中共目前的任務。

「我們目前這一時期底特點，就是在於：反「左」錯誤的鬥爭，正是勝利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底條件，是勝利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底特殊形式。」（斯大林：給集體農莊同志們的回答）

那麼，這個反列甫主義的、半托洛斯基主義的李立三路線底實質（現在，就是李立三同志本人，也拒絕和斥責了這一個路線），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李立三同志用另一條，半托洛斯基主義的戰略的計劃，來對抗我們上述的那個戰略的計劃。照他的意見，中國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如果沒有同時發生的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他認為產生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已經到處成熟了。因此，共產國際應當在全世界採取『進攻的政策』。因此，李立三同志認為，在中國內部，可以實行沒有準備的暴動，而實現這一種暴動，是要使工人階級底革命組織陷於破壞的。

在這個理論裏面所包含的許多盲動主義的成份，很快就被中國共產黨所剷除了，並沒有在實際的革命工作中，得到完全實現的機會。因此，這個理論所剩下來東西，就只是一種托洛斯基主義的，對列甫學說的否認，否認資本主義不平衡的發展，否認革命不平衡的成熟；只是一種托洛斯基主義的不信任主義的觀點，不信任：中國資產階級民主的革命之勝利，可以不需要世界革命直接隨牠發生或與牠同時勝利的條件。這一種理論，可以使黨陷入機會主義，消極等待主義的地位。可是，就是這一種理論，也已遇見黨內羣衆嚴厲的反抗；並且被他們稱爲一種與列甫主義沒有絲毫相同的觀點。

其次，李立三同志又根據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說沒有大的工業中心，就不能組織蘇維埃政府；因此，李立三同志在事實上是拒絕了組織蘇維埃政府的任務，拒絕了在革命的根據地上建設常備紅軍的任務，只是命令紅軍去作經常游擊的進攻省城的戰爭。

完全根據托洛斯基主義的精神罵中國共產黨及共產國際的路線爲「地方保守主義的」傾向。托洛斯基主義者認爲：蘇維埃政權只有佔據了大的城市之後，才能有成效地建設起來，如果沒有這種條件，那末，農民是不能有所作爲的，他既不能建設蘇維埃制度，也不能建設紅軍。可是，中國共產黨內部分領導工作同志（以李立三同志爲首）並不能給這種觀點以反抗。

李立三同志是不能給這種觀點以反抗的，因爲，他沒有估計到無產階級目前已有的那種偉大的政治組織者的力量；在目前無產階級已經（甚至於就是在城市運動比較落後的條件之下）應用他這種組織者力量來領導農民運動了。

無產階級已經經過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而在政治上規定了農民的要求（沒收地主的財產，重分一切土地，以滿足貧農的利益），無產階級正經過自己的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紅軍的戰爭，而且無條件的要在中國蘇維埃政權裏面取得大多數。

在中國革命目前這一階段上，無產階級已經在工農民主專政機關中間（蘇維埃與紅軍）實現自己的領導權；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日益在國家政權裏面鞏固起來。

因此，托洛斯基主義的說法（說蘇維埃政權必須發生與鞏固於工業的中心，然後才能擴展到農村中間去），已經遭受了完全的破產，暴露出自己的投降主義的實質，這樣的說法，對於先進的工業國家（如德國）本來是正確的，可是，對於中國這類的國家，

則已經完全不符事實了；列甫早已預料到，在這類國家裏面所發生的革命，將『表現出一種比俄國革命更加厲害的特殊之點來』。

同時，中國革命的經驗，完全暴露出托洛斯基主義之孟塞維克主義的實質；不僅是否認農民運動的作用，而且完全不相信無產階級底力量，完全不相信無產階級的組織底政治領導作用。

李立三同志，因為抱着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所以就忽略了一切在土地革命區域裏鞏固蘇維埃政權的任務。

很明顯的，李立三同志，既然抱有這種半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自然也就不能以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精神，來提出目前階段中最主要的任務——在革命根據地上而建立工農常備的紅軍，也就不能『給羣衆以軍事的指導，保證（首先也許只有本國不大的區域內）十足的政治自由……盡量發展下層民衆的革命創造性』。（列甫底話）

因此，李立三同志，以及瞿秋白同志（在三中全會上）也就不能估計到紅軍進攻長沙所得的重要教訓，而只是用政客官僚的口氣，承認中國革命已經開始『和國民黨實行正式的（！）戰爭』（摘錄瞿秋白同志底結論），却沒有盡量提出階級力量對比關係的問題，完全沒有了解：在目前情形之下，在現有的工農力量組織程度之下，是不能給帝國主義的與國民黨的要塞以迎頭的打擊的。而且李立三及瞿秋白同志又沒有指出長沙黨

部領導同志所犯的那種不鳴人耳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些同志以官僚主義的態度，完全忽視了羣衆的獨立性與發動性，完全忽視了組織工人階級的任務，完全忽視了建立真正羣衆的，真正由選舉出來的城市工人兵士貧民代表蘇維埃的任務。

李立三同志，既不了解由無產階級經過常備的，有紀律的紅軍及蘇維埃政府以領導農民的任务，自然，也就不能給土地革命（農民爭土地的鬥爭）目前的任務，以任何具體的回答了。

由公開右傾機會主義（主張『聯合富農』，反對給雇農與紅軍兵士分配土地等等），動搖到主張在目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就要開始『把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動搖到主張在蘇維埃區域內設立蘇維埃農莊與集體農莊，動搖到投降於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這就是李立三同志在土地問題上的『路線』。

值得特別指出的，就是：中共領導機關中這一部分所謂『左傾的』同志，雖然在口頭上似乎喊得很『左』，要求共產國際採取左的『進攻的』方針；可是，他們却甚至於不能給許多黨部裏面這一種右到極點的機會主義的實際工作，如像將土地留給『賢良的』，沒有逃出蘇維埃區域的地主等，給以應有的反抗！

李立三同志與瞿秋白同志還比不上先進的農民，因為，先進的農民都知道以平民的手段對付地主，根據（主要的是這樣）人口多少（而不是根據生產工具之多少）來分配

土地；而李立三同志及瞿秋白同志則完全沒有了解到這一點。因此，關於沒收一切地主（『賢良的』也罷，惡劣的也罷）的財產的任務，關於給貧農與中農來徹底重分一切土地的任務，關於組織貧農團及鞏固與中農聯盟的任務，都為李立三同志及瞿秋白同志所仇視，這一點也是完全顯而易見的。

恰巧就是在中國革命這一個中心問題（土地問題）上，完全暴露出『左傾』詞句的實質：『左傾』的詞句，不過是用來掩蔽極右的事業，掩蔽右傾機會主義的勾當，阻礙土地革命，維護『賢良』地主及『賢良』富農底利益。

李立三同志在工人運動問題上所犯的錯誤，也是同樣的嚴重，同樣是足以危及革命運動的發展。在這個問題上，李立三同志很巧妙地造出一種奇異的理論，否認工人運動落後的事實，反轉來辯護這種落後，讚揚這一種落後，稱之為革命的美德。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工人羣衆中，中國共產黨是負有很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影響。大家又知道：這種政治影響在組織上的鞏固是多麼薄弱；秘密的赤色工會是多麼薄弱，會員是如何的少；黨內無產階級的成份是如何的有限。

在這種條件之下，李立三同志不集中全力去提高工人階級底組織性，不去使黨的政治影響與其組織影響互相適應起來，却反而在其發表於布爾塞維克及紅旗上面的論文裏，說出這種的論調：『在客觀的革命形勢之下』，『主觀的力量』是不重要的。這完全是

追隨自發性的尾巴主義的觀點。而且，在他的冒險主義計劃十分流行之時候，他在事實上已經把職工會及青年團取消了，用官僚主義的，脫離羣衆的，上層分子的『中央行動委員會』，來代替了他們。

李立三同志，不但完全不注意工人階級職工會的組織，而且又完全反對發展工人階級局部的經濟罷工的鬥爭，而且以毫無準備的『總』政治罷工當作兒戲，結果自然要妨礙工人階級底發動性，自然要削弱黨在工人運動中的地位。自然，在這種反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共產黨無論如何也不能消滅現有的工人運動落在農民戰爭之後的現象；而同時，爲要保證中國革命真正的勝利的發展，共產黨又無論如何都要消滅這個落後的現象才行的。

很明顯的，中國共產黨，如果不戰勝黨內李立三這種半托洛斯基主義的盲動主義的觀點，如果不同時毫不妥協地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在實際工作中，右傾機會主義依然還是主要的危險；而『左傾』的李立三路線，又正是右傾機會主義直接的掩護），就不能在中國革命裏而實現正確的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領導。

現在中國共產黨所做的，正是如此。牠正在執行列寧底指示：

『唱高調，吹牛皮，——這是失了階級性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固有的特性，富於組織性的無產者，會要懲罰他這一種『癖性』的；懲罰之法，大概是要將他們嘲

笑一番，并將他們趕出任何重要職務之外了』。

這樣一來，中國共產黨，就要使自己的布爾塞維克主義化，更進一步，就要使自己的隊伍在共產國際列甫主義的領導之下，更加團結起來。

分析現在時期的鬥爭，應當要注意到：暫時我們還沒有全中國的客觀革命形勢。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的浪潮還沒有匯合起來。這些運動總合起來還不能夠保證必需的力量，去襲擊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農民的革命鬥爭，現在能夠勝利的，還只不過在南部幾省發展着。統治階級各派的分裂和互相鬥爭，還沒有使他們完全削弱而走到政治上的完全破產。但是最近事變發展的趨向，即使革命形勢不能夠包括到全中國的地域，至少也要包括幾個主要的省分。這一過程的促進，大部份要看共產黨有沒有正確的策略，首先是能不能正確的解決那領導和發展蘇維埃運動的任務。

——摘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案

蘇維埃的運動，已經對於黨提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以調節這一政府的行動的任務。這個任務是有第一等重要意義的。對於中國工農蘇維埃政府的問題，黨應當注意到：在最有保障的區域建立起真正的紅軍——完全服從共產黨的指導而能夠做這一政府的支柱的紅軍——然後這個政府纔能夠有相當的力量和意義。必須集中注意去組織並且鞏固紅軍，以便在將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佔領一個或者幾個產業行政的中心城市。

共產黨應當明白：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別條件之下，是第一種的任務，解決這個任務，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強大的開展。

——摘錄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政治決議案

校者附白：列甯論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那篇文章，已譯登紅旗週報第六期增刊。

第二時期的中國經濟

澤 民

第三時期是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由繼續動搖而至於完全破壞的時期。當一九二八年夏天，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上決定這個估計的時候，以布哈林爲首的右派曾提出一個對抗的大綱來，說：『第二時期是世界資本主義改道的時期』，右派的這種觀點，當然直接走向社會民主黨的綱領，和馬克斯主義列寧主義的綱領沒有絲毫相同點的。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以空前的震撼力動搖着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已經幾乎一年了，現在固然還沒有達到恐慌的最高點。而有些國家已經從經濟恐慌進到政治恐慌。這種事實當然證明右派的理論的完全破產，同時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兩條戰線的鬥爭中，正確的革命路線的一大勝利。

現在中國也在第三時期的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破壞之第一步——世界經濟恐慌——的抽搐中間。世界資本主義列強，重新鼓起力量向殖民地進攻以求獲得穩定。於是在大戰中乘機前進了好些的中國民族工業資本，就陷入慢性的衰落之中。同時，中國的農村經濟崩潰的過程亦加速前進了。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加緊吸收中國原料的結果，中國的農村經濟更加變成世界財政資本的附屬品，和受世界市場所左右。原料輸出的種類，在停戰以後十年之內，突然增加得異常繁多，大部分的中國農民家庭變成爲帝國主

義國家工業的需要而生產，同時，糧食的耕種却因此被放棄，於是連年發生景象可怖的飢荒。從一九二一年起，中國已變成糧食輸入的國家，此後逐年增加，至一九二七年而達一萬三千七百餘萬兩。中國經濟的這種破壞狀況，是第二時期內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穩定的基礎之一，然而中國及一般殖民地經濟恐慌之深入，亦促成此次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現在，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既已用了空前的威勢在發展，中國的經濟狀況就更加沉淪入悲慘的境地了。

第三時期中世界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破壞，依照目前的世界恐慌所暴露出來的現象去觀察，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發生下列的諸種影響：（一）由於恐慌使列強間爭奪殖民地銷貨市場更加劇烈的結果，對於世界唯一協定關稅的中國市場將發生列強空前劇烈的屯併競爭。（二）由於世界農業恐慌異常深重，並且由於世界工業恐慌機械的使殖民地原料發生生產過剩的結果，中國的繼續已久的農業恐慌更遭受新的打擊。（三）此外，又由於世界資本過剩，輸出資本的需要愈加迫切的緣故，列強間為佔領中國的鬥也爭就空前的劇烈起來，由來已久的中國軍閥戰爭，至是乃不得不以新的和擴大的規模去重演。（四）美國的國內市場衰落，使美國對外政策的侵略性加強，在中國的政治上經濟上將有嚴重的影響。首先就是壟斷中國市場鬥爭的加劇，軍閥戰爭的更加殘酷，英日對美衝突形勢的嚴重，與對中國財政金融之控制，等等。

爭奪原料出產地，貨物銷售地和資本輸出地而鬥爭，原是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的一般的特徵，資本主義局部穩定的開始破壞，把全部機械螺絲絞緊了。爲在劇烈的經濟恐慌之下求出路，帝國主義列強勢必傾全力於加深對殖民地的剝削，和重行分配殖民市場的鬥爭。處在這種狀況之下的中國，遂不得不走上國民經濟總崩潰的道路。現在雖然僅僅在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破壞的第一步中間，這種形勢已經非常明顯了。因此在第三時期中間，擺在中國勞動羣衆面前只有兩條路：或者是屈服於帝國主義的壓力，沉淪入歷史上空前的經濟浩劫（Catastrophe）；或者是反抗這個傾向，由革命中把自已從帝國主義的破壞影響下解放出來，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

現在我們來提出中國經濟內部狀態的一些主要問題來攷察一下。

一 農業經濟崩潰中的新趨向

中國的農業經濟崩潰，不是從第三時期中開始的。農村的落後狀況和封建剝削關係的存在，帝國主義者的利用這種關係來剝削中國農民，就造成了農村經濟崩潰的客觀基礎。在這種基礎上發生出來的中國軍閥戰爭，加速了崩潰過程進展的速度。大戰以後，一九二一年中國開始大規模輸入糧食，此後年年增加，到一九二七年已達一萬三

千七百萬兩。同時原料輸出的在價格總額上，在品類的數量上，都大大增加。至一九二八年為止，輸出總額值銀一千萬兩以上者達二十餘種之多。即此一端，已可看見中國的農業實在是世界財政資本的附屬品，牠是為帝國主義列強的工業而生產原料的，因為要完成牠這種任務，牠就不得不放棄中國所需要的糧食生產。

但是作為原料供給者的地位的上升，還是第三時期以前（主要的是第二時期內）的事。第三時期中間這種情形根本變過了。由於世界經濟恐慌，尤其是由於世界農業恐慌的發展，即以中國作為原料輸出的國家而談，其地位亦已經開始衰落，轉變成原料輸入國家，而同時糧食的輸入却用了新的規模在增進。

關於這個，如果需要一些事實來證明，那麼這種事實是俯拾即是。由於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全國大飢荒，單是一九三〇一月至七月間在上海一埠，輸入的米已達七千多萬兩。同埠輸入的麵粉小麥尙不在內，而上海的許多中國麵粉廠却都是用輸入的美國和坎拿大麥子為原料的。從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起，中國出口大宗的棉花，豆油，花生仁，花生油，紅茶，植物種子，等等，都驟然低落了。到一九三〇年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的發展，中國輸出中佔首位的大豆，和佔次位的生絲輸出也驟然低降了。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下列諸端：

第一、世界農業恐慌，早在這次經濟恐慌爆發之前存在了。這次的經濟恐慌，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工業生產驟然低落，於是機械的引起殖民地的原料過剩，而使世界農業恐慌愈加深刻化。在這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大豆。大豆輸出，年年是突飛猛進的，而今年開始以生產過剩聞。因為大豆是中國的特產，並無他國競爭的緣故，所以輸出衰落是完全由於世界需要的減少。然而這還不夠，我們要注意

第二、由於世界農業恐慌，農產品大跌價的結果，競爭也劇烈起來了，中國的農產品，在世界市場上迅速的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的原料所排擠了。這種現象，由來已久，如中國茶為印度茶所排擠，中國絲的輸出價額在過去曾有增進，但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地位却日益被日本所排擠。第三時期中發展着的世界農業恐慌加快了這種過程。比如棉花之輸出，百分之九十多是往日本的。自一九二八年起，日本因中國棉價貴，逐漸兼用美棉，印棉，和他種棉花，而使用中國棉就日益減少。自一九二九年起，世界棉花價格跌去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國棉花的輸出就更加低落了。絲在去年開始受到致命的打擊。人造絲的競爭已使絲業一般的受到排擠，這次的世界經濟恐慌，更使歐美各國對絲的需要驟然降低，於是絲價低落，而中國絲則以繭價甚貴，成本不能降低，以致輸出完全停止，演成目前絲廠全體停業的狀況；同時日本的絲更加佔據世界市場。甚至像牛皮的輸出，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銷路也被南美洲的牛皮所排擠。

羊毛則因澳洲羊毛生產過剩，而中國羊毛的輸出被排擠

這樣，可見第三時期中世界經濟恐慌的發展，使中國作為原料輸出國家的地位也衰落了。然而這也還不夠。外國原料在世界市場上排擠去了中國原料的地位，同時就窮追牠到中國來奪去牠在本國市場中的地位。大家知道的，中國的工業像烟草火柴是早就使用外國原料來生產的了，其他輕工業，像製藥，化妝品等，亦完全是使用外國原料的。但是最近幾年來，中國的主要工業，紡織業，也逐漸使用美棉印棉而不用中國棉花了。唯一的主要原因，就是外國棉價格便宜。尤其有趣的是絲。去年中國的絲業界開始了空前未有的現象，就是『華商輸日，一變而為日商輸華』。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據說是因為繭子來源缺乏；這當然是非常膚淺的解釋。實際是中國農民的繭生產事業早在崩潰之中，技術退步，成本加高，加以世界經濟恐慌使世界絲價大跌，中國的絲廠遂再不能用中國的繭子作為原料去繼續生產，而希望輸入價格較廉的日本繭子。這就是日本繭子侵奪中國繭子在本國市場的銷路的開始。甚至於麥子（作為麵粉廠的原料）也走入這一步了。因中國的糧食恐慌，麥價大貴，所以中國上海，天津，東三省等處（尤其是上海）的麵粉工廠，都用洋麥製粉。這樣看來，可以說中國的原

料在本國市場上也普遍的被輸入原料所排擠了。

一方面是原料生產的絕對衰落與崩潰，另一方面是糧食生產的完全崩潰，形成中國

農業經濟的總崩潰。

這種過程的世界經濟的意義，可以簡單的這樣解釋：按照經濟學的規律，農產品的價格是由劣等土地的農產品的成本費，加平均利潤，加絕對地租所形成的。當供給超過需要時，則市場價格低落，劣等土地即以成本過高不能獲利而被荒廢，價格即由較次劣的土地上所生產的農產品來決定。現在世界農業恐慌有固定的降低價格和以世界規模縮小耕種面積的趨勢，凡屬劣等土地皆在被荒廢之列。中國的農村，不幸而是世界上最劣等的土地。

當然劣等的意義不是單指土質而言的，中國運輸系統的大規模破壞，使中國的土地在經濟的意味上都變成劣等。就講土質，那麼中國由於帝國主義者地主軍閥等的野蠻剝削，使農民絕對窮困，在奪去了土地中的化學質以後，再沒有力量用肥料加以補充，土質已毫無疑義的在變劣（甚至東三省那麼肥沃的處女地，因剝削過甚的結果亦日變瘠薄，所產大豆，品質已遠遜於前）。有些其他地方（如陝西甘肅等省），已快成不毛之地（原因是不但地力窮竭，並且連年飢荒，樹林草根都被食盡，以致土內不能含水，自然變成沙漠。），那麼這個世界的過程影響中國如何慘酷，不難知道。中國農業，並不是用資本主義方法來生產的，農民不但不求獲得利潤，並且因為無處謀生，所以連工錢的大部分也被剝削去，忍飢忍寒死守着土地免得立刻餓死。一九二九至三〇年的

大飢荒，顯然證明中國小農的抵抗，已經快到力盡筋疲的時候了。

尤其可怕的，就是中國農業目前所處的地位，並不是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前期現象。連年的大飢荒，農民的大批被迫離開土地，當然加速土地集中的過程，但是由於失地農民過多，地價異常高漲，高利貸的發達，和一般農村內部的政治條件，任何值得注意的採用機器耕種及資本主義化是不可能的。即使現在有些地方採用了機器耕種，他們的生產品的價格在世界市場上一樣是不能競爭勝利。所以中國目前這種農業恐慌，只能更加加深封建的剝削，佃租，高利貸，賦稅，商業資本等等吸盡了農民的血汗和土地內的滋養料，破壞了生產，可是並不引導到任何出路。

這樣，所以中國的土地問題，只有農民的土改革命可以解決，只有土地革命可以挽救這種總崩潰的危機。同時，從這裏可以知道目前中國土地革命的特點，是牠和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簡直絕對不能分離的。即使農民已經完全沒收和分配了地主階級的土地，如果沒有掃除帝國主義的勢力，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還是不能中止的。

二 民族工業的破產

第三時期內帝國主義對中國榨取的猛進和中國農業總崩潰過程的開展，造成民族工業破產的客觀條件。

首先我們來對於民族工業的現狀作一個概括的觀察。

一九二九年起的銀子跌價，使外國進口原料價格機械的漲高了許多。加以進口業外國洋行和在華各外國工廠的操縱，進口原料的價格更漲到超過牠們所應漲的限度。這樣中國的火柴業和捲煙工廠就陷於原料來源斷絕的恐慌，紛紛停廠倒閉了。

國內戰爭，牠不但破壞了中國的國內市場，並且直接毀壞中國的運輸工業。『第二時期』中國國內戰爭的特點，就是牠的破壞性更加猛烈，牠的繼續期間更加延長，牠的休息時間更加縮短。自從一九二八年到去年，不曾有一年沒有戰爭，而且愈演愈酷。現在蔣對汪馮間的戰爭還剛結束，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已在佈置新陣勢了。鐵路運輸系統是已經完全毀壞了，航業亦然。招商局實際已經破產了好幾次，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亦不能維持，要求南京政府發公債去救濟。

運輸系統的破壞，首先打擊到礦業和內地的民族工業。中國民族資本所辦的礦廠，實際已經全體停止工作了。內地的工廠，如鄭州的豫豐紗廠等，在戰爭期內，完全停工，原因就是由於原料不能運入，生產品不能運出。這種破壞的影響造成一種現象，就是使所謂民族工業，實際只集中在沿海及長江一帶的幾個主要商埠，而內地的民族資本工業歸於消滅。

這樣，在中國的民族工業當中，剩下來的已經不多了。除開製藥廠，製化妝品工廠

等較不重要的工業不計外，絲業是已經破產了，麵粉工業自經一九二三年以來已經開始破產，一九二九年的飢荒使麥價騰貴，給了北方的麵粉工業以最後的打擊。紗業自一九二九年起亦已轉入衰落的狀況，自八月起中國棉紗即繼續跌價，目前已跌到兩年以來的最低度。（這是在銀價跌去了百分之三十五的時候！）

綜合起來，我們可以說，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破產，並不是前途的問題，而是已成的事實。

第三時期中，中國的民族資本工業不得不完全破產，是由於下面的許多原因：

第一、就是前面論農業中所說的原料的供給，完全轉到依賴於國外的輸入。這嚴重的事實的意義，就是中國的民族的民族工業的生產循環的前半段（貨幣——商品），已經被世界財政資本所控制了。

第二、就是市場的絕對縮小。這須得詳細攷察一下。在第二時期中曾有一個可注意的現象，就是中國的工業『國貨』頗有一些海外市場。這事實表面上一看，似乎中國的民族工業的發展使中國有成爲輸入原料品和輸出工業品的國家的趨勢。事實恰是相反的。中國工業品的出口是因爲國內的軍閥戰爭，農業崩潰等等原因，過剩的生產品被從國內市場驅逐到國外去。試一看那些國外市場是什麼就可以明白了。原來那個海外銷路，是在華僑中間的，主要就是南洋羣島和香港一帶。現在世界經濟恐慌發

展的結果，海外華僑紛紛破產失業，被逐回國，那麼這個『海外市場』自然就要消滅了。不用說，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的基礎是國內市場。但是整個的國內市場是在縮小的，在第三時期中尤有以下的特徵：（一）軍閥戰爭的更加猛烈，加速破壞中國國內市場；（二）農村經濟的崩潰，與民族工業自身的破產，使失業增加，一般購買力降低；（三）運輸系統的破壞，使商品不能經常流通；（四）農村革命的發展，劃出一大部分蘇維埃區域，這些區域，即使現在還不會採用對外貿易壟斷的政策，事實上已經由軍事包圍與外界隔斷，幾乎為大工業生產品所不能侵入之地；（五）一般的農村中『土匪』如毛，使商品流通受到極大的障礙。凡這些條件，都是中國民族工業的商品流通與帝國主義國家輸入商品的流通所共同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市場異常的縮小了，嚴格的說，只是沿海和長江珠江等流域一帶火車輪船（用兵艦保送）所能及到的區域和一些最大的都市而已。

第三、航業由於戰爭的結果，已經幾乎完全被外國資本所壟斷了。這種過程到第三時期中已經完成。從此中國民族工業的商品的運輸要被財政資本所控制，受到制命的打擊。

此外，尤其重要的，就是——

第四、世界經濟恐慌的發展和深入。此次世界工業恐慌發展的結果，一切商品都

猛烈跌價。加以彼此爭奪市場加劇，競相鼓勵輸出以求減輕生產過剩的恐慌。在這種情形下面，中國民族工業的商品不得不跟着跌價，於是世界經濟恐慌機械的（Automatically）使中國民族工業陷於恐慌。

第五、這次世界經濟恐慌所顯示的第三時期特徵之一，就是關稅戰爭達到最猛烈的程度。各帝國主義國家增加進口稅率已經到禁絕的地步了。在殖民地中，也訂立各種優惠於母國，而禁絕其他國家商品輸入的關稅。現在世界上唯一有最低關稅率，足以爲屯併（Dunpining）的舞台的就是中國了。這種向中國的屯併，將爲第三時期中世界財政資本挽救其危亡的方法之一，而且現在已經開始了。屯併的結果，是把中國民族工業所有的市場奪去，被『洋貨』所佔據。

大家都知道，當一九二八年，中國民族工業因戰爭暫停而稍有恢復的時候，取消派那時就異常興奮，高叫中國資本主義已經向前發展，中國『資產階級穩定』已經開始了，實際是剛剛相反，在那時候民族工業的非民族化已經開始。至於現在的民族工業現狀，當然使取消派的『理論』完全破產。根據上面的觀察，我們更可以斷言說，在第三時期中，中國的民族工業將歸於完全消滅。今後中國民族工業中一大部分的企業，將歸外國資本所管理。此外，除開許多企業倒閉後無人過問以外，其他一部分的企業一定是被中國的銀行或錢莊所吞併（歷來中國有許多紗廠早經銀行錢莊所『改組』了。這些

總廠積欠累累，利息極重，不得已而『改組』，『改組』以後又陷於破產之境，再被別的銀行錢莊來『改組』，如此循環不已，在他們的管理之下逐漸歸於消滅。這就是中國民族工業的前途。

站在這種『前途』前面，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想些什麼出路呢？也建築起中國的關稅壁壘來，禁止外國工業品的輸入麼？他們不敢夢想。（其實即使實現了這一着，也何嘗救得危亡？現在中國民族工業的競爭者已經不僅在國外，而主要的已經在國內了。）停止軍閥戰爭，和取消『苛捐雜稅』麼？這是辦不到的。阻止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麼？這是他們所不能也不願的。唯一的出路，他們就想到增加對工人的剝削。因為在生產循環中，前一段的原料購買既被財政資本所控制，後一段的生產商品（商品——貨幣）亦被財政資本所佔奪，那麼祇有在中間一般的生產過程和勞動力的購買中去求出路。所以『生產合理化』與『科學管理法』的聲浪『甚囂塵上』了。

最近南京政府所召集的『全國工商會議』已於十一月八日閉幕了。閉幕以後發出一個宣言。這個宣言表面上看去雖然很空洞，實際却是一個資產階級與國民黨政府聯合一致向工人階級進攻的宣言。牠裏面舉出『本會議所兢兢致意者也』的共有十條，實則所有其他的都是『希望』，『逐漸』與『渴望』實行而已，惟有一條却認為當務之急，要馬上實行的，那就是『生產合理化』與『勞資協調』。然而這宣言還是極力修飾，做得很冠冕堂

皇的文字。至於對此工商會議的論文和會議上的發言，那就更加露骨了。比如閉會日的演說，每個都拿工人做中心問題，申報閉會特刊上載張軼歐一文，公然宣言勞方工作能力如不改進，則工資決不能比例照加，和『盡量增加生產，肅清匪共』，為唯一出路。申報工商會議特刊創刊號上一文，公然說增加關稅和廢除厘金都不能辦到，所以工商會議的唯一日程乃在『解決勞資糾紛』。看了這種資產階級的供狀，就可以知道這個工商會議的真實意義。

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威迫之下，中國民族資本的實行『合理化』不是從現在起了。工人們的大小便早就有了限制。『合理化』發生了上海最近絲廠女工爭渡溺斃十餘人，和軍服廠火燒不放女工逃命以致焚斃數十餘命的慘劇。『合理化』的結果使報紙上『形似工人之無名男子』跳黃浦，吃安眠藥水，上吊等等自殺慘案每天登載數起，也不是從現在開始的了。一般的對工人扣工資，加時間，扣賞工，罰工等等的苛酷，恨不得一手拿出來的工錢完全用另一手從罰工裏收回去。這樣的實行合理化，也無以復加了。然而民族工業的破產却毫不停滯的進行。上海絲廠女工因『合理化』的緣故，被迫從四隻眼做到六七隻眼，並且採用黑板制度，在版上照出一根絲做得不好就被罰工，甚至開除。但是這樣加強剝削的結果，現在還是一百零八家完全停業。從加強剝削中間依然找不到出路。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自掘墳墓，這就是第三時期中，中國民族資本的末路。

三 手工工廠與手工業

在第二時期內，中國各大工商業中心城市及其附近的手工業有了結構上的變遷。因爲原料輸出的增加，發生了許多爲粗製原料而工作的手工企業。甚至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也大部分轉移到爲出口而工作。在第三時期中，這種關係根本改變了。最初是由於中國製造原料的技術落後，原料都由粗製後再輸出，改變做不加工即輸出。最重要的是油坊的衰落。從一九二八年起，豆油輸出銳減，而大豆輸出同時激增。桐油的輸出也有漸被桐子輸出所代替的趨勢。其他如花生油，棉子油等，莫不如此。第三時期內，中國原料的輸出既然普遍的衰落，那麼，這些爲出口而工作的手工業生產，將完全消滅是不用懷疑的了。

此外專門銷售於國內的各種手工業呢？目前因絲業破產的關係，我們連帶的看到綢業的破產。因綢業破產而染業亦連帶破產。綢業在國內是遇見人造絲織品和印度綢等大敵的。

甚至於酒，也在洋酒的競爭之下而衰落了。紙在洋紙的壓迫下而幾乎消滅了。甚至於醬和醬油等中國所特有的消費品，也在日本和歐美輸入品壓迫之下而破產了。

在第三時期內，爲爭取市場，不論中國的或者外國的資本，都企圖侵入手工業所一向佔據的許多生產部門內，去開闢投資的領域。例如上海杭州一帶電機織綢廠漸漸多了，而許多手工業織造廠爲之倒閉。但是這種趨勢現在進行得異常遲緩，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世界經濟恐慌的環境之下，這些新工業起來時馬上就捲入恐慌的漩渦之中走向破產。另一方面，一般消費者由各種手工業品的製作粗劣，與價格之比較的昂貴，在消費的趣味上也發生了改變，捨去本國的手工業出品，改用洋貨的替代品。這樣，根本使許多種類的手工業商品漸漸絕跡，這樣的例子，比如綢緞之與人造絲織品，或外國綢緞，中國水旱烟之與紙煙等等。中國民族工業與手工業的關係之特點，就是，民族工業往往在外國資本主義工業已經消滅了某項中國手工業，而以某種新輸入品代替之後，才有華人的工廠，也仿製該項輸入品去與之競爭，這樣，他自己首先就處於不利的基礎上。像中國的紙煙業，因爲佛及尼亞煙業已成爲中國人的口味，至於不得不輸入佛及尼亞煙業從事製造，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外國資本開了破壞中國手工業的道路，中國工業資本跟在後面去推波助瀾。

然而手工業這一個生產部門，雖然現在是在破產的過程中，可是比起民族工業資本來，牠是『頑強』得多了。由於中國大多數失業者的無處謀生，由於積累起來的資本無處流通，手工業往往成爲這些過剩的勞動力與資本的逋逃藪。所以一方面天天有巨量

的手工業者破產，另一方面又有巨量的手工業發生，此外在農村經濟崩潰中，農民的家庭手工業亦是維持生存的一種鬥爭方式。因此，在這一方面，崩潰的過程是被許多相反傾向所中和而緩慢了。

由於以上這些原因，所以至今未曾破壞淨盡的封建式的行規束縛，就更加遭受破壞，而『在行會』與『不在行會』中間的鬥爭，就此更加劇烈起來。在這種鬥爭中，國民黨的軍閥政府是傾向於維持行會的，因此在立法上，封建時代的政治與行會的關係，遂一度再現。牠強迫非行會中人服從行規。然而這種立法在目前的條件之下，實際是一種欺騙而已，因為一雙腳站在幾把椅子上的國民黨政府，決不會對於手工業者有什麼幫助，維持行會的結果，只是幫助大商人和手工作坊主人壓迫更小的企業而已。

四 國內市場

由以上所說的種種，我們對於中國的國內市場，已經可以作一個整個的攷察了。這裏首先要說明的，就是國內市場的崩裂為許多地方性質的市場，而統一的全國市場反日見狹小。

關於全國市場，上面已經略略的講過了。戰爭，運輸系統的破壞，與農村中革命運動的發展（包含土匪的活動擴大）使全國市場逐漸衰弱，商品的輸入內地困難增加，

而工業製造品的行銷，主要的漸被局限於各大城市自身及沿着幾條交通幹線的區域。

然而這是否說內地的商品交換衰落而倒退入自然經濟去了呢？

不是的。在這裏我們得到了市場的崩裂，與商品交換的價值數量的減少，可是交換關係却更加發展。這就是說，原來是統一於全國市場的地方市場，現在一天天的失去了與全國市場的聯繫，在這些市場上所交換的商品，由全國遠近和海外運輸得來的較少，而市場附近各地農民和手工業者所生產的商品的交換反增多了。實際在市場上買賣的商品與其價格數量雖然降低，可是農民羣衆的依賴於交換而生存的狀況却比以前增進了。

這種現象，根據於下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農民羣衆的貧窮化，使他們的購買力低，另一方面，他們愈是貧窮，愈是陷落在高利貸與商業資本的陷阱裏，而不得不用現錢或其他的形式出賣他們所有的生產品。同時，如果是有點小土地的小農，或佃農等是受到了異常猛烈的剝削，致使他們的所得遠在他們自己的勞動力的價值以下，那麼日益增多的失地和地少的農民，却同時又不能得到適當面積的土地，使他們可以充分使用勞動力而形成勞動力的剩餘。這種剩餘，他們儘可能的應用於手工業的生產上面去。傾向於分離獨立的地方市場是這樣形成的。

地主階級的奢侈的增加，使他們逐漸由自然物租轉移到向農民收取貨幣地租，國民

黨軍閥政府的向農民改用貨幣收取田賦和捐稅，這種轉變至今是沒有完全，而是繼續着進行的。目前的世界農產品跌價，更增加這種趨勢，以便把農產品跌價的損失轉嫁到農民身上去。地主的高利貸者化，的兼商業，使地主階級在收取地租的範圍以外，更加去剝削農民的金錢。同時民族工業的破產，引起資本的急劇的倒流入鄉村，這種流動方向與由於鄉村中農民革命的發展，資本逃向大城市是很矛盾的並存的。從城市資本的流入鄉村，也更增加高利貸的作用。

這樣，所以農民非出賣他的生產品不能夠生存。另一方面在一次賤價出賣盡了他的農產物，去付租，還債，納捐稅之後，立刻不得不再借債去高價買進糧食和一切日用品來維持生存了，於是他不購買亦不能夠生存。農民愈窮，他所能買賣的數量愈少，然而這並不阻止他的愈加依賴於商品交換。

因此，我們得到了以下的奇特現象，就是資本主義的關係（貨幣關係）是日益擴大，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更正確些說是一般的生產却異常的衰落了。全國市場崩裂，可是地方市場並不更加興旺。由是帝國主義者剝削中國市場的可能性不能不降低，可是中國農民和一般勞動羣衆的受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宰割却更深了。這種過程的結果，是在上面講農業的部分中已經提到過的，那就是空前的大飢荒與整千萬農民的餓死。

然而國內市場的分裂還不止像上面所說的那樣。還有另外一方的過程與之同時並進的，那就是中國市場的依着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的存在，而碎裂成幾個中心。

這種過程已經進行了許久了。現在還沒有達到頂點，也永不能完全達到頂點的。第三時期中，世界資本主義穩定破裂的第一步——世界經濟恐慌——發展的結果，更增加帝國主義者彼此爭奪市場和侵入別國的勢力範圍的鬥爭。可是同時，由於上述種種原因所造成的中國市場的分裂為地方市場，却促進了中國國內市場的重新組織，而愈加確定各區域內的地方市場與各帝國主義國家所佔據的中國通商口岸的關係。民族資本的破產與貨幣資本的佔到統治地位，更助進這個方向。民族資

五 貨幣資本的統治與國家財政

從以上種種，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就是，在第三時期內，中國的國民經濟遭逢全部崩潰的浩劫。在這個基礎上發生了貨幣資本的膨脹與佔據統治地位。而這個現象本身亦即國民經濟崩潰的表現。

前面說過，中國國內市場雖然衰落，可是貨幣經濟關係却更加普遍。這就是形成鄉村中高利貸資本佔統治的基礎。理論上講，高利貸的發展，起源於貨幣貯藏，只要

在貨幣的幾種功用發展完全的時候，高利貸資本就能夠出現。現在中國農村經濟的崩潰的過程既然是和交換過程的擴大同時進行的，所以凡貨幣流通所到的地方，就成爲高利貸剝削盛行的地方。

中國的地主階級大多數都是自己經營高利貸而成爲高利貸者。高利貸者也依靠高利貸而轉變爲地主。

這樣農村裏而形成高利貸資本，或者更廣泛些說，貨幣資本的統治。貨幣資本統治的形成，在第三時期的中國是和農業生產的衰落，土地的被荒廢同時並進的。如果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上升期，高利貸的發展（本身雖祇破壞舊的生產方法而不建立新的）間接的還盡了積累資本以便過渡到更高生產形式的作用，那麼在目前的中國，牠連這種間接的進步作用也失去了，牠只是破壞，直到農村盡成爲荒地的時候。

在工業方面怎樣呢？工業方面，在第二時期中，早已深陷於債務了。在這裏，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是和所有歷史上的先例相反的。不是高利貸破壞舊生產方法，掃除了道路以待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却是侵入到已經有了相當發展的資本主義大工業的領域之內，宰制了牠，把牠屈服在自己的威權之下，而又並不像帝國主義各國一樣形成銀行資本與工業資本混合生長的財政資本，却是用債權吞併了中國垂危的民族工業，讓牠在貨幣資本的介殼之內逐漸腐爛而至於消滅。

這樣，在第三時期內，我們看見中國逐漸形成地主，商業資本，與高利貸，和工業資本的「三位一體」了。這種三位一體的具體形式，是貨幣資本的統治。

經濟上的三位一體必然要成爲政治上的三位一體。蔣介石的國民黨南京政府，早就有人說『浙江財閥的政府』了。這是不正確的。牠是在全國國民經濟總崩潰之下，快要變成貨幣資本佔統治的地主資產階級政府。在已往，中國的貨幣資本經過代發公債，包攬稅務和借款給軍閥政府等等作用，早把政府機關變成剝削勞動羣衆的工具，且由此而伸張了他們對政府機關的影響。現在，在民族工業破產的時候，他們又經過發行絲業公債，航業公債，組織航業銀行等等，把政府機關作爲他們吞噬民族工業的工具了。另一方面，政府機關中的官僚們自身，也變成貨幣資本家。宋子文，孔祥熙一般人已和銀行老板沒有區別。『國府要人』莫不擁貨鉅萬。蔣介石一個人在上海置有許多地產，好幾個大小菜場都是他的。在公債交易所中，他是一個最大的「大戶」，據說在蔣閥馮戰爭中，他曾不少次數用幾十萬元，賄賂馮玉祥的軍隊，叫他們退兵三十里，以保公債漲價，博取數倍於賄賂金的厚利。中國的貨幣資本已日益和國家機關混合生長在一起了。

然而這一切過程，整個的却只爲造成一個輸送管的系統，將崩潰中的中國勞動羣衆的膏血輸送到外國財政資本的銀庫裏去。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企業都有極高的利潤。

當美國和歐洲的銀行利息率低落到二%，三%的時候，中國的外國銀行保持着極高的利息率（短期存款八——九%）。一般的中國銀行利息率也都有這樣高度。長期存款，利息率有到一二%的。外國的一般在華企業，紅利至少二〇%，最多到六〇%至七〇%。然而這却在中國民族工業破產的時候！這種高度的利潤率，是和中國高度的高利貸剝削（最普遍的按月三〇%），息息相關的。中國的農民工人和一般勞動羣衆的剩餘勞動和一部分必需勞動所產生的價值，經過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者，資本家，和政府官僚等等的剝削，集中起來，經由原料輸出，商品輸入，軍火購買，匯兌操縱，投機事業等一切道路，匯流到財政資本的囊袋裏去。最明顯的，例如錢莊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一切商人的買賣，款項交付都經由外國銀行，而中國商人方面與外國銀行的一切交付手續，都經過錢莊。帝國主義者挑選了這個半封建時代式的貨幣資本企業作牠的代理人。最近由於貨幣資本更加集中的結果，銀行的勢力漸漸壓倒錢莊，開始在對外貿易上代替錢莊的任務了。但是無論銀行或是錢莊，都依賴外國銀行或外國企業，而是他們剝削中國的代理人。他們和財政資本混合生長在一起。

另一方面，由於貨幣資本不需要全國的市場，所以在工業資本日益衰落之際，中國的統一市場就更加崩裂而成爲許多區域，每個區域各以一個或幾個軍閥與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口岸爲中心。軍閥戰爭與革命更加加重這個趨勢。上海，天津，漢口，杭州

等大都市迅速的生長了，於是在歷史上又開創了新例：不是因爲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所以有大城市的勃興，乃是工業的普遍衰落，貨幣資本的集中，造成了大城市的生長。這種形勢，一方面加強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對抗的形勢，另一方面，由於貨幣資本與軍閥政府的結合，造成強固集中的勢力，去做統治階級的暫時的避難所。他們要傾其全力以白色恐怖壓倒這些城市中心的工人革命運動是自然的結果。

統一於是愈加變成幻影了。各區域內佔統治的貨幣資本家，地主，商業資本，彼此之間並無共同的利益，相反的，由於他們各自依附於一帝國主義國家的緣故，他們相互間利害衝突愈加猛烈。軍閥戰爭於是走上更兇猛的階段了，於是全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過程更加加速的前進。

這樣，所以貨幣資本的統治的真實意義，乃是中國歷史的向後倒退到資本主義以前的關係中去，牠是中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過程的一種方式。勃興的貨幣資本家，他們自身是反動趨勢的代表者。因此，他們的統治的反動，無恥，詐僞，和貪酷，在歷史上也找不出第二個例子。

但是，這種統治地位本身就宣告牠自身的不穩固。因爲牠並不是貨幣資本發展或生長的表現，而僅僅是集中。在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破產的時候，中國愈加經工業資本的積累轉移到貨幣資本的積累。這種積累，是用了無數的細小的吮吸管，插到全國國

民經濟的一切毛孔中去吮吸血液的方法來進行的。因此，在第三時期險惡的世界行市和中國國內情況之下，被每一個經濟界的震蕩像鐮刀刈草似的刺去的小『暴發戶』，是比較從每次暫時『平靜』的期間，像雨後春筍似的生長起來的還要多。而資本集中的規律在此處的應用是像在其他部門中一樣的，所以貨幣資本的集中，是由鄉村到城市，由錢莊到銀行。銀行的得以逐漸壓倒錢莊而統治中國金融，並不是貨幣資本的加強，却是牠是衰弱。

最後，我們還得指出，就是根據整個民族工業破產與非民族化，外國輸入的增加與原料輸出減少的趨勢，中國今後的入超將在一個新平面上去增加。同時由於中國海外華僑的破產，與一般對華投資的不可能，中國的入超抵補也許要成問題。另一方面，政府財政的破產危機日益緊迫，而大批舉借外債或許被帝國主義相互間的國際矛盾所阻止。如果這樣，那麼中國貨幣資本家階級或許要在一個極大的金融恐慌中同歸於盡，也未可知的。

六 第三時期帝國主義的對華經濟政策

在這裏，自然不得不重行提出下面這一個關係重大的問題了，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大規模的對華投資究竟是否可能呢？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復，一定得是否定的。

不錯，歐美工業恐慌，資本過剩，和中國利潤率的高，對於財政資本國家的資本輸出是極大的引誘。而中國的資產階級現在，由於工業資產階級的更加依賴於外國財政資本，由於中國失業失地的窮苦羣衆的鬥爭日益威脅統治階級的存在，已經改了口調了，例如他們用了孫中山的話，宣言說：『在不妨害主權的範圍內吸收外資來建設實業，解決民生是歡迎的』等等。同時在相當的範圍以內，日本確已遷移了一些企業到中國來，目的是在剝削中國賤價的勞動。但是大規模的外資輸入有極大的阻礙，這種阻礙在事實上是不可超越的。

這種阻礙之所以發生，整個的是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

由於中國軍閥戰爭猛烈化的結果，中國的國內市場破壞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在這種情形下，開設工廠，是沒有前途的。在第三時期帝國主義列強剝削中國市場的需要更加迫切的情形之下，投資於運輸工業是一切的根本。果然在最近一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航業投資有相當的增加。但是鐵路運輸系統，不但沒有任何新投資的可能，並且連舊有的系統也破壞到不能修理的地步了。革命運動的發展，中國市場的崩裂，羣衆購買力的降低，與一般世界經濟的衰落，使他們在中國的工業投資成爲不可能的事，十多年來，中國並沒有多少外國工廠建立起來，只有銀行，地產公司，及賭博性質的

跑馬場跑狗場等非常興旺，可以知道了。因此第三時期內帝國主義的對華經濟政策有牠的特點。下面試就各主要方面分析一下：

(一) 爲擴充中國的市場，採取利用和加深中國經濟崩潰的方法。美國的小麥麵粉之輸入，烟草棉花等原料的輸入，是利用中國農業崩潰去挽救他們自己的農業危機的。這方面運輸的增加，也可以挽救他們航業的恐慌，減少停船。

(二) 爲輸入工業品，他們所採取的方針是更加廣泛的研究中國商業習慣，深入內地，建立廣大的銷售網（仿效美孚公司的政策），務使至今尙屬手工業所供給的商品改爲由船來品供給。因此各國都派代表團來華考察。

(三) 儘可能的建立貨物運輸系統。這裏他們所注意的是汽車公路。因爲這項建設費用少而作用大，可以深入鄉村。可以解救他們自己本國內汽車生產過剩的恐慌，所以美國福特公司尤其想捷足先登。

(四) 盡量排擠中國民族資本，控制牠們，使他們非民族化。

(五) 爲實行上面的綱領，却有一個根本的障礙，就是中國的革命運動。上面這些政策的本身，其意義就是使極大的中國手工業者羣衆和農民生計盡絕，轉入反抗和革命。這樣，中國蘇維埃運動愈加增添了新力量。因此伴着上面的政策之施行，必然要採取慘酷的壓倒中國革命運動的血路（現在進攻蘇維埃區域就是這種政策）。

土。因此戰爭的危機與武力干涉中國以消滅中國蘇維埃運動的聲浪一齊高起來了。實在的，不經過武裝干涉，上面那個『謙虛』的經濟綱領也是達不到目的的，但是『武裝干涉』，却要擴大中國的軍閥混戰，並且引到帝國主義者的中間相互的戰爭。

七 蘇維埃區域的經濟

爲什麼只有蘇維埃革命可以中止中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路程，目前在炮火中的蘇維埃區域的經濟已經可已證明了。

據蘇維埃區域的報告，由於沒收和平均分配地主土地，取消債務的結果，糧食的價格大跌，米一石只售二元銀子。這證明什麼呢？這證明中國農民從封建的和帝國主義的剝削之下解放出來以後，農業經濟崩潰的現象立刻可以消滅。而『健全的資本主義』的現象就此發展起來。在鬥爭包圍中的蘇維埃區域已經發生『剪刀』現象。凡農業品價格都低降，而工業品的價格就上升，手工業因此有發展的趨勢。有許多商品像火油、鹽等，因爲都是自外輸入的，所以價格特別昂貴，一般的有許多工業品也都受同樣的影響。然而有一件事是和軍事包圍無關的，即此種工業品價格上騰中，一部分是由於蘇維埃區域內主要賴手工業生產，在世界市場的價格與農業崩潰再，不能屈折中國農業與手工業商品的價值的相互關係到相反的地步時，他們中間的正確的比例却標明出來了。

一旦蘇維埃革命還是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時，這種狀態是常態。工業品價格的高漲引導到工業生產的進步。這恰恰和目前非蘇維埃區域的工業生產品價格低廉（造成工業破產）與農產品價格的高漲（由於農業崩潰）恰恰相反。

蘇維埃區域的經濟狀況，外面得不到詳細的報告。但是以上這一點已經可以指示中國蘇維埃運動全國勝利，推翻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起國家對外貿易壟斷（假如在短時期內蘇維埃的中國尚與資本主義的列強並存）之後，中國的國民經濟將起怎樣根本的變遷。

中國的蘇維埃革命決不會停止在資本主義的任務上。牠的勝利就要開闢社會主義發展的前途。因此，在脫離了全國國民經濟總崩潰的危機而走出來的中國經濟，將不止由衰落轉到發達，並且要轉到用社會主義的速度去發達。在蘇聯的幫助之下，他可以比蘇聯已往更迅速的恢復與改造。在牠沒有達到這一步之前，在目前的狀況之下，牠一方面供給了中國如何可以得到解放的實例，另一方面牠成爲積極的破壞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主要原素。在積極擴張，進行戰爭以推倒國民黨的統治時，牠日益擴大脫離帝國主義與地主資產階級殘酷剝削的區域，挽救幾千萬人於飢荒餓死；同時蘇維埃區域愈擴大，帝國主義和中國統治階級的市場愈狹小。牠在經濟上，也是破壞帝國主義和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要素。

中國經濟的性質

伯虎

國民黨人說：現在封建勢力，已經完全消滅，而資本主義，在中國本來是沒有的；現在只等他們來建設民生社會，推人民進大同世界。像這樣的說法，來判定中國經濟的狀況和前途，我們先把他撇開不講。因為他們的先總理，在民生主義裏，本來就說過，將來大同世界裏，『資本家將大發其財，工人亦可大得工資』，地主自然應該大收其租了。批評這種『理論』，對這種人辯論，那比對牛彈琴還不如呢！

我們這裏要講的問題是：現在中國的經濟，究竟是什麼性質，有那些勢力推動中國的經濟，向那裏發展上去？

立題法

要研究一個社會是部落社會，是宗法社會，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是要看這個社會上，他的全部國民經濟中，究竟是那種經濟形式，佔統治地位。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純粹清一色的社會制度。在一種社會裏，總包含有過去社會的餘跡，和新社會的種子。而且這些餘孽和種子，又與當時社會的成分互相作用，形成種種過渡的形式，攜帶各色各樣的外表。因此，不但是說不到什麼純粹的封建制度或資本主義等等，而且這些制度，還不是一目就可以了然的。中國歷史非常長久，而地而特別廣闊，國內所有的經濟制度，尤其複雜。在蒙古

新疆青海西藏一帶，還盛行着部落，宗法社會的生活。其餘大部份都是鄉村。鄉村經濟中，獨立自耕的成份，到現在已經是很少，而多數是租佃過活。他們都是用最原始的工具，作手工的生產。除農業生產外，就有手藝的生產，生產其他一切物品。只有在少數大城市中，有近代大工廠；有的是外國帝國主義開設的，有的是合辦的，有的是中國人辦的（現在暫且不講他們的比重和相互關係是怎樣）。上面這四種生產方法中，部落宗法社會，在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佔不到重要的勢力，沒有多大的比重。手工藝的生產，或者是個人獨立的，或者是行會式的，或者是受商人的定貨，形成家庭手工業的地位，或者是工場作坊的形式，這已經是工業資本的第一步了。農業的生產，不是單交捐稅，便是兼交地租。至於新式工業，那是資本主義的式子。所以統統歸納起來，就是這些經濟，不是帶封建的性質，受封建勢力所支配，就是資本主義的制度。現在討論的，就在封建關係和資本主義制度，在中國經濟中，究竟誰佔優勢，他們發展的程度和性質，究竟是怎樣？

同時，中國是受帝國主義經濟政治勢力緊緊壓迫的國家：財政，金融，礦山，鐵路，森林，海船，工廠，大商舖，多是他們的產業。因此，這些勢力，在中國經濟中，又佔什麼地位，起什麼作用呢？

簡單一句話，外國財政帝國主義，中國封建制度，民族資本主義，相互間的關係，

究竟是怎樣？

中國的商業資本

講到這裏，我們好像是忘記了中國的商業資本主義。其實並沒有忘記。商業資本主義，並不是一種社會制度，並不是一種生產形式。只要社會上有了相當的分工，一個人或一個集團，不能完全產生自己所必需的東西，而却有餘下來自己所製造的東西，那末買賣的中人，商業資本，就可以存在。他是可以建築在任何種生產方法之上，可以存在於任何社會制度之內的（只有原始共產社會和將來共產主義時代，沒有他的飯碗）。他可在游牧部落和漁業部落間做買賣，他可以在封建社會裏做生意，他可以販賣奴隸，他可以買賣手藝工人的產品，他可以替工業資本家擔任流通的責任，也可以充當外國帝國主義的買辦。他的作用，第一，就是把什麼東西都商品化。但是，這絕對不就是等於資本主義。中國的商業，發展了很久很久，而且很深很深。不僅是農民繳租納稅和自食外所餘下來的農產品，都商品化了；地主收租所得的穀物，除自用外所餘下來的，都商品化了；手藝品商品化了，而且連土地也商品化了，女子也商品化爲丫環了。

托洛斯基取消派的人們，看見中國的商業資本，就痰迷心竅的狂喊，說中國早已發展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已在中國經濟中，佔領導的地位了。嚴靈峯先生，在『再論中國經濟問題』中，竟把商品化，貨幣二個觀念，和資本的觀念，完全相等起來。照他

這樣說法，不但中國封建制度在沒有產生前，已經小產了，而且資本主義，真的在三千年前，已經盛行了。像這樣沒常識的人，還要罵人家是不肖之徒，真是可憐。嚴『肖子』的方法論，用來分析社會是不夠的，用來分析他自己是夠了。他的大作既登在『動力』雜誌商品上，一定是為資本家賣力了！

不過商業資本，自己雖然不是一種社會制度，不是一種生產方法，却有媒介社會變化的作用。他曾經把古代社會，變成奴隸社會。他販賣手工藝品。他還可以進一步的，因為他熟識市場情形，而向手藝人定貨（一定的式樣，質料等等）；供給他原料，工具；甚至於什麼都由商人作主，商品製好後，實際上是給手藝人工錢。這種家庭手工業，實際上，像馬克思說的，已經實用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了。再進一步，把這些手藝人集合在一個工場或作坊之內，這已經是工業資本了。也許工場主和作坊老板曾經是商人出身，或還是繼續做買賣，我們決不能指贖為馬，混說一切商業資本，就是工業資本。

中國家庭手工業，確是很多：紡紗，織布，編席，製鞋帽，織襪子，等等類類，簡直說不盡。但是他們在全部手工業中，絕對沒有佔統治地位。即使他們佔了統治地位了，也算不得是中國已經發展了資本主義經濟。並且家庭手工業，在封建制度之下，完完全全可以存在的，並且歷史上無論在那一國都存在過。只有工業革命後的機器

生產，才衝倒了家庭工業。

商業資本使土地變成商品，使農民更依靠市場，使地租貨幣化，這雖然使經濟本質沒有大多變更，却是使資本主義容易發生。他和高利貸一起，利用農民的缺乏，借貸銀錢，種子，工具，使農民破產，土地集中，使大規模農業，資本主義農業，容易進行。甚至於利用封建諸侯的短少現款，使他們的經濟命脈，受商人高利貸者支配，促進封建制度的崩潰。但是這種過程，本身並不就是資本主義。

中國商業發展得很久，不論向來怎樣的『重農輕商』，這類作用，當然是發生的。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買辦就幫着前者推銷洋貨，收買原料，殖民地化中國。但早買辦並不就是帝國主義者！

封建制度

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握住中國的經濟命脈，設立新式的工廠。

中國人自己，除各地開設有許多工場作坊外，也設立各種近代式工廠。帝國主義，土著資本主義，商業資本，同時又不斷的破壞農村經濟。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封建關係，不但不會純粹，而且也不是全盛的時代了。

說到這裏，有一個方法論上的問題，必須預先弄清楚。凡是一個社會，有他新興的時期，全盛的時期，衰落的時期。在衰落的時期中，舊的生產關係（生產工具的佔有，生產條件的分配，剝削的方式，……），已經阻礙了新的生產力的發展；新的生

產力，已經有了相當的發展，已經相當的破壞了舊的生產力，或者開始破壞他們；舊社會的經濟基礎，開始動搖或崩潰，舊的上層建築，拚命在衛護這種基礎；舊階級把住了政治權力，極力維持舊的制度，尤其是舊的剝削方法，這樣，當然阻礙新勢力的發展。但是新勢力，當然是存在了，這是不成問題的。內容雖在變換，而形式還維持着。這裏就要有新的衝破舊的革命！

現在試看中國封建制度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怎樣呢？資本主義，是否衝破了封建制度呢？這裏當然不是說，資本主義已把封建關係，打破得一點無餘，或者只有一點點影子，只有殘餘的殘餘。這是不會的。資產階級的革命，本來就不會真正徹底的。英國的工業革命也好，法蘭西的大革命也好，普魯士式的解決土地問題也好，美的農主Farmer制也好，在經濟上，當然封建『殘餘的殘餘』，是要存在的，這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肅清。托洛斯基派的門徒們，居然把中國的封建勢力，看成只有『殘餘的殘餘』，『殘餘渣滓』。他們簡直想把中國的經濟狀況，和英，美，法，德同等看待。這種論法，簡直可以說是不害臊。最可笑的，就是他們把人民中間遺留下來的舊文化，數了一大套，算是『殘餘渣滓』賬裏的極大部份。要知道，文化本來是上層建築的上層建築。不僅是在新經濟戰勝了舊經濟之後，不僅是新政權替代了舊政權以後，就是在順利的迅速的建設新社會的時候，文化上的舊東西，還是要存在很久很久的。倘

若說：『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的特權慣例，……：鄉村中之一切風俗習慣，賽會，迎神，械鬥，私刑，……：僧尼，道士，巫，覡，神君，地保，鄉長，祭司，廟祝，舉，貢，生員，翰林，進士，』，那末英，美，法，德等資本主義先進國，難道就沒有這些名稱不同，而實質相同的東西嗎？難道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經發展到英，美，法德一樣的程度了嗎？恐怕連嚴先生自己，雖然只坐在上海租界上，作坐井觀天之舉，也不至於承認吧！

封建制度，是否只是『殘餘渣滓』，是否『投降』資本主義，——這並不是看社會上還遺留有多少封建制度的文化來決定。實際上遺留下來的舊文化，就是在新社會中，也不是像托派所說那樣，只有一點『殘餘渣滓』，往往是整個系統。問題是在乎封建制度的基本特點，是否保存着，當時的政權，是否保障這些特質，不為資本主義的利益來取消這些利益。

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不論是採取任何種方式，他的內容總是：根據手工的農民生產方法，而農民把一大部份勞動結果，白白的交給封建剝削者階級。詳細的說，封建社會的基本生產關係是：

第一、封建領主或地主對於農民施行一種超經濟的壓迫，甚至於使農民失去身體上的自由；第二、根據這種權力剝削農民，不僅取得農民的全部剩餘勞動，還要侵佔到他

們工資的一部份；第三、主要的剝削外，還有其他種種的剝削。所以封建的社會關係，是地主用強力剝削農民，以至於侵佔他生活必須的部份，爲要維持這種剝削，甚至於使農民的身體，在法律上，或實際上失去自由。

在封建制度全盛的時候就是這樣情形。但是在封建制度初成立的時候，並不是這樣，在封建制度衰落的時代，當然也不是這樣了。大家都知道封建制度是怎樣起源的，不論起源的具體形式是怎樣，總是在開始的時候，諸侯原是保護農民，免致受搶劫欺侮，因此就收取一定量的貢品或勞役。開始本來不很繁重的。後來才逐漸形成上述三種現象。此後，因爲商業資本發達，商人販賣許多珍奇東西，諸侯就不願意只靠自己的農民，製造東西給他用了。因此各種田事以外的勞役，就都用各種形式免去：或增加田役時間，或增加田租，或添加各種捐稅。而且封建領主，貪得無厭（向來只靠農民土產過活，究竟一人只有一個肚子，吃穿都有限量。後來有商業資本做媒介，那就揮霍無窮盡了），所以剝削程度，就愈加重難，可是形式却可以而且必然變更。譬如一切勞役，都用租稅來替代，地主只要能夠得到高度的剝削，就不妨身體上讓農民自由，反正農民在經濟上受牽制，丟也丟不掉土地上的苦工的。譬如俄國在所謂『農奴解放』之後，俄國奴役農民的封建剝削，不但沒有消滅，反而加深。只有沙皇及其臣僚們，才會說『農奴解放』令實行後，封建制度已經『殘餘渣滓』了。因爲這裏的問

題，不是在乎表面上幾種形式的改變，是要看那維持封建制度的基本關係，是否還存在。封建地主，不僅因為自己的需要，必然變更幾種剝削的外表，而集中剝削於租稅，而且因為農民的反抗，也不得不用『贖買』等等形式，『放棄』幾種特權怪例。然而基本的剝削，還是保存着，而剝削的程度，却是有增加而沒有減少。苛捐雜稅，勒索，預稅，難道是資本主義式的，靠經濟勢力的『自由平等』的剝削嗎？這還不是勞役制的替身嗎？雞租，腳米，人事，解而，包三擔，租飯，年送，……還不是封建的形式嗎？至於拉夫，那簡直是『不自由』的復活。其實即使不拉夫，農民就有自由嗎？嚴先生說現在地主與農民是建築在『平等』『自由』的原則之上，大概他忘記了保護地主利益，而自身又抽括農民的軍閥制度了！大概他根本忘記了現在統治鄉村和城鎮中的土豪劣紳了！嚴先生偏在這裏看得出農民和地主，有『名義上的平等』，說是『農民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則任何地主絕沒有強迫農民佃地的可能』。難為嚴先生，原來農民是這樣自由呀！在我們說資本家和工人有『名義上的平等自由』時，是有他經濟基礎的，就是說，工資一般的等於勞動力的價值。難道農民繳納一切租稅後，還留有勞動力的價值嗎？

托派的先生，總不至於否認現在農業危機普遍的情形，農民繼續破產的現象吧。農民因為實在生活不了（所得抵不了工資），當然就沒有餘錢來改良工具和土地，所以

土地一天一天的變瘦；有的只好放棄土地做土匪等等，因此荒地愈弄愈多。其中原因，除天災外，就是因為剝削得太嚴重。而這類的剝削，是由『超經濟的力量』，由政權，成例等的力量來維持的。這就是封建的勢力。封建的關係，現在的確不像全盛時代那樣了。但是最主要的關係：嚴重的剝削，還是依然存在。因為封建勢力是該滅亡的時候，當然有許多封建形式，已經消滅了或變換了。本來西歐各國，曾經也經過這樣的時代，並沒有什麼奇怪。中國和各國不同的地方，就是中國商業發展的特別久，特別深切，因此土地就早已商品化了。既然土地可以買賣，小地主就容易多。這是封建制度下，商品化的過程。這固然可以促進土地集中，發生資本主義農業，但他本身並不就等於資本主義的發展。

托牌取消派所藉以否認封建制度的，在嚴先生方面，還有二點。第一，他說：『不管地租形式如何，剝削程度如何，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吧了』。倘若地主軍閥，土豪，劣紳所榨去的，只是剩餘價值，為什麼農民維持不了生活呢？除非說：農民的生活標準是等於『該死』才行。不但如此，嚴先生還想把百分之五十到七八十的租稅率和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率來對比，說是兩者沒有什麼高下。大家知道，剩餘價值率，是剩餘價值和勞動力價值的比例，可是租稅率是由全部農產品來計算的，農產品裏，不只是農民當時勞動的結果，還有一部份原料，工具等等的代價也在內。這樣

的對比，不是明明的要欺騙人，便是太沒常識！

第二，他說到封建關係，總是說什麼『純封建式的』等。嚴靈峯開口閉口，罵人家是不肖之徒，不懂辯證法。難道按照辯證法，要不是『純封建』，就是資本主義已經替代了封建，而封建只是『殘餘渣滓』嗎？這種方法論，才是標本式的機械論，折衷說！倘若封建制度還是『純』的，——其實那裏有『純粹的』社會，不過是『全盛的』時代罷了，——拿地主還要農民造房子和製造用品，那末，根本就談不到推翻封建制度。只因為封建關係，是在臨死掙扎的時候，因為封建餘孽還用超經濟的力量，拚死的維持原有的剝削關係，才須要用革命的方法來推翻他，消滅他。現在封建勢力本來不『純』，本來是餘孽，但是還是維持着主要的剝削關係；却並不是『殘餘之殘餘』，『殘餘渣滓』，而且並沒有『投降』資本主義，還統治着社會。

托洛茨基取消派的方法論，本來是主觀論和折衷說的雜種。老托的中國門徒們，也只會坐在上海租界上，憑主觀的一味胡說。要知道，分析社會現象，不但是需要深刻的了解現在情形的底細，而且還要用歷史的觀點來考察；辯證法是歷史的唯物論。考察中國目前經濟性質，需要了解現在的現象是怎樣發展而來的，經過什麼變化。光看現在的情形，就免不了把租稅捐賦率看做剩餘價值率，把土地商品化，看做資本主義農業。中國現在的土地關係和剝削關係，是經過上述情形，演進而來的。主要的，

用『超經濟力量』來維持的剝削，還是保存，農民的土地問題，始終沒有解決。試問究竟什麼時候，曾經有過一番變化，使資本主義替代了封建社會，封建勢力投降了資本家？照托派的邏輯，本該是三千年前，就有過這般變化，可惜嚴先生沒有具體明白的說出來。我們且不要說得太遠，恐怕冤枉了嚴先生。就假定『國民』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政府吧。那末，『國民』政府的停止二五減租，屠殺農民，實行營業稅，大概就是十足資產階級的政策了吧！這樣把急的救護地主，真是難得。怪不得嚴先生一方面看到農民的『自由』，『平等』，另一方面，却哭喪着臉說：『封建的，半封建的領主，貴族，官僚，也因此站腳不住了』。封建勢力真可憐，怪不得國民黨先總經理說，『地主要起來革農民的命』了。的確，應該跟着總理和嚴肖子作地主革命了！

資本主義與農村

中國現在革命中，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土地問題。而中國工業還沒有發展到社會化的程度。所以，除非說，等到資本主義大大發展之後，我們再來革命，那時候工廠國有問題和土地問題可以並重。不然，土地問題，是主要的急待解決的問題。就從這點來說，現在的革命，就已經不是托派說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只是附帶解決民主革命的任務了。再不然，就需要兩次社會主義革命了。這簡直是夢話。

我們已經說過，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有相當的發展，這是必然的現象。但是絕對不像嚴肖子所說那樣。他說『農業經濟踏進資本主義的領域』，『農民兩極化』，『一部份農民之變成鄉村資本家』。不錯，資本主義是開始侵入農業方面。但是這只是開始，這是半封建勢力統治下所固有的現象。據他自己引來的統計，農業機器的進口，抽水機，新式灌溉等等的使用，倘若和中國全國農業拿來比一比，那簡直是滄海一粟，絕對不能作為農村一般的資本主義化的表徵。

嚴肖子的救命王，護心盾甲，就是所謂『新式地主』，『商業地主』的理論。這種『新式地主』，既不實行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倒活像孫總理『中國式的地主』，他也不像西歐地主剝削得那樣兇！這種『商業地主』的名稱，更是滑稽可笑。辯證法雖然是講矛盾，却容不了這樣矛盾的觀念。就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裏，地主的存在，也該當他是封建的遺孽看待。而商業資本在托派看來，本來是當作一般資本主義的一分子。那末，『商業地主』，應該是資本主義的地主了。中國地主原來比西歐地主還要先進呢！這樣先進的地主，却要用『超經濟』的力量，來剝削百分之七八十的農民生產品。其實，『商業地主』，並不是資本主義統治了鄉村的表徵，不過是土地商品化了，而剝削還是照舊。

嚴靈峯為要證明農民經濟的不重要，來證明中國經濟的資本主義性，竟把資本和貨

幣的觀念，相等起來。他說『農業經濟中假使沒有貨幣，嚴格的說，假使沒有與城市交換，不能進行農業經濟的再生產的，這難道不是城市『領導』鄉村的『性質』的關係嗎？』同時，他說地主向農民要的只是交換價值，而土地又可以以貨幣來買賣。他一而再，再而三，把貨幣當成資本看待。這也是把商品化當做資本主義的禍根。他以為鄉村必須和城市交換，這就是等於城市領導鄉村；那末，城市不向農村交換農產品和原料等，難道城市可以再生產嗎？豈不是鄉村領導了城市了呢！這裏只有把一切貨幣和商品，都當做資本看待才行。可是馬克思主義，一年萬年，也不會變成這樣的嚴肖子胡說。

農村中的確發生農民兩極化（除一般的貧窮化外）。但是第一，這不是主要的現象，雖是重要的現象。主要的現象，是地主的剝削，封建制度下所流行的高利貸和商業資本的剝削，豪紳的剝削，再加以軍閥的搜括。我們絕對不能把地主剝削和軍閥制度分開。兩極化的現象，就是照嚴先生自己說，雇農也只佔全體農民十分之一，而其餘的，却是受封建餘孽的剝削。第二，他沒有指出中國富農實行半封建剝削的特點。他並沒有看到兩極化的特殊情形。這或者是他不願說破的：說破了要打自己的臭嘴。

所以，農村中主要的關係，還是個農半個農受半封建式的嚴酷剝削和軍閥系統的搜

括；同時因爲農民兩種極化的特別情形，應該格外加緊反對富農。資本主義在鄉村中有影響，但是現在農業危機，農民破產的情形，主要的不是資本主義在鄉村中發展的結果。

資本主義的發展

在城市中，資本主義，有沒有發展呢？有的。不但在帝國主義侵入以來，介紹到中國不少近代機器的生產，而中國人也自己採用了許多機器生產，自己也發生了資本主義；而且帝國主義未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已經有了手工場和作坊。我們上而已經說過，這已經是工業資本主義的第一步。但是中國民族工業的生產，是不是在非農業生產中，或甚至於自己一部門生產中，佔了優勢呢？不。一方面，手工業生產還維持着很大的地位。這還不重要。另一方面，頂重要的，就是中國本國的工業，不僅是由帝國主義所引起，而且是受帝國主義所支配。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介紹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同時，因爲帝國主義偉大的財政資本勢力，却支配了中國經濟，而且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帝國主義發展的辯證律。嚴靈峯笑人家不懂得帝國主義的壟斷性，其實他自己真的不知道壟斷是什麼。壟斷不僅是沒有消滅競爭，却是更大規模更兇猛的競爭，以至於『動武』。帝國主義介紹給中國機器生產，可是中國資本主義幼弱，政權又不在資本家手裏，不能實行高度關稅政策等等來抵抗外資，却競爭不過帝國主義，所以又受他支配

和阻止。不久以前，上海厚生紗廠又要出賣給外國人，這是一件事實。這並不是說，中國人自己開的工廠，過了十年，一個也不會添加。這裏不能專靠加一個工廠減一個工廠的數目字來考察中國資本主義的情形，又需要觀察發展的（歷史的）過程和性質。中國工廠中可以沒有洋顧問或洋工程師，但是在經濟上受外國資本支配。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可以踏龜步般增加，發展，尤其是像在帝國主義戰爭和用非經濟手段，抵制等時候，較快的發展。這是事實。嚴先生何必怕談戰爭和抵制呢？嚴先生在引用的統計中，一方面把外資創辦的和中外合辦的企業，都當做中國資本主義成份看待。另一方面，又把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中國企業發展的數字，胡亂的拿來，却把大戰期中中國輕工業暴發和戰後大批破產的情形，輕輕掩遮過去。這明明白白是自欺欺人的方法。而且軍閥制度的存在（各據一方阻礙投資和推銷，戰爭，沒有裁厘先加各種稅捐，借外債而對外資作種種讓步等等……），又要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鐵一般事實，那得否認。

所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這許多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是否能夠衝破，打倒這些阻礙呢？不。第一，中國資本家本身孱弱；第二，他自己土地化了（也佔有土地）；第三，恐怕動搖了土地私有，就要影響他自己資本的私有，所以不能打倒封建遺孽和軍閥勢力，不能抵禦他們的反抗，只好向他們投降。而且又因為同樣的緣故

，不能打倒帝國主義，排擠不了他的勢力，抵敵不住牠的侵蝕，只好受他支配。

帝國主義和中國經濟

那末，中國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一點不會發展了嗎？

不。 嚴先生說：『後進國工業有發展的可能』

，『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發展』，『資本主義關係可以在殖民地發展和起領導作用』，『帝國主義經濟整個方面是推動資本主義經濟成份前進』，……不錯。但是這些『成份』，『關係』，『方法』，是帶着什麼性質，是誰的東西呢？ 第一，大部份的資本主義式的企業：金融機關，工廠，交通工具，礦山，油井，等等，是帝國主義的。 第二，許多企業，是合辦的性質，支配權是握在他們手裏。 第三，許多『獨立』的中國企業，實際上是受他們牽制。 第四，即使有些企業不受牽制，那末嚴先生也不否認，中國企業，本是世界帝國主義經濟一部份，和以為這是細小微弱的部份。也只得隨着帝國主義的大浪潮漂流。 所以中國所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是採取了受列強帝國主義完全支配的性質，是帶有帝國主義附庸的性質，簡單一句話，殖民地的性質，絕對不是獨立的性質。 嚴先生自己也認為『輕工業方面的發展，表現這裡民族工業的特性和經濟力』。 試問有沒有一『獨立』的資本主義，而只發展輕工業的？

現在我們暫時假定，這樣的發展形式可以前進下去。 那末，這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這叫做殖民地化！ 印度就是先例。 什麼叫殖民地化呢？ 在工業方面，

不問帝國主義主觀上有什麼企圖，結果，上面所說的矛盾（帝國主義一方面促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普遍化，一方面又阻礙土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推進中國資本，只向帝國主義所需要，所缺乏，自己所不容易發展等等方向進行。所以，中國不但可以發展一部分輕工業，而且連一部分重工業都可以發展。不過都是帝國主義直接的附屬，一點也不能獨立。牠不但要受帝國主義支配，而且還少後者不得。譬如，在印度造成橡皮，爲的是給倫敦汽車廠做車輪。這裏要注意的，這並不是簡單互相依賴的關係，而是絕對不平等的關係。所以嚴先生說的『帝國主義這樣地供給原料來幫助中國輕工業的發展』，『殖民地可不需急速的發展重工業，能夠擴大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嚴先生的意思，固然覺得帝國主義居然這樣大慈大悲，中國資本主義可以佔着這樣千古難逢的便宜，可是，其實，這是十足的殖民地化吧了。我記得俄國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叫人家去學習學習資本主義，中國的托牌取消派，竟在這裏捧帝國主義的場，真是古今爭光，後生可畏！中國人也該學習學習殖民地化呢！

現在來說一說帝國主義對農村經濟的影響。帝國主義的商品，第一就是破壞鄉村的手工業。帝國主義需要中國原料，盡量搜括，只出低廉的價格。這一方面是加緊擁有原料的地主的剝削；二方面，形成各種專爲供給原料的耕種（大規模或小規模）；第三，加緊商業資本的作用，破壞農村；第四，直接成立各種墾植場。假定帝國主

義勢力，可以順利發展下去的話，印度又是我們的先例。鄉村中甚至於可以發展大規模資本主義的企業；外國的，中國的。但是，這是農業上的殖民地化！帝國主義爲要容易奴役農民起見，爲要得到額外高度的利益起見，一定要維持封建的上層建築，保持封建式的剝削程度！托派的肖子們，死也不會懂得這點，死也不會知道印度的情形，只知道帝國主義破壞封建經濟的空話。南美洲墾植場中的黑奴勞動，列甯就叫他是農奴式的。亂引列甯的話來騙人的嚴靈峯，應該去想一想。

嚴靈峯聲聲口口說，世界經濟是有機的整個體，好像人家都不懂。其實他自己真是不懂得。有機的整個體裏，難道就只有資本主義的成份了嗎？難道各部份都一例『平等』『獨立』的嗎？這樣只知道『一般的』整體，而不知其中組成部份的情形，真是見到森林，見不到樹木，是十足機會主義的方法論。托派罵人家機械主義，自己却是道地的機械主義。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兩種勢力

我們已經詳細說過，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夠解決土地革命，而且自己也不能獨立發展工業。如果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發展了，這是帝國主義勢力的膨脹，是殖民地化的過程。但是歷史的過程，並沒有這樣簡單。上面所說的殖民地化，是假定一切都是『一帆風順的』。實際上情形複雜得多。

世界上已經有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他本身不但已經大大的縮小帝國主義的範圍，而且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就是促進帝國主義勢力的衰弱。帝國主義自身間，各國間矛盾一天天緊張（德國復興，意大利新興等等）。美國在戰後與英國爭雄。各帝國主義自身間的發展範圍縮小，競爭程度却擴大加深。最近全世界發生恐慌。企圖殖民地化中國的，不祇一個帝國主義，狗多肉少。這些情形，都要阻礙殖民地化的進行。而且各帝國主義自身的消長，也就是形成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帝國主義者又不敢切投資。同時，却有一個最重要的勢力，就是中國工農羣衆，受帝國主義豪紳軍閥資產階級的壓迫剝削，必然要起來反抗。他要澈底的解決土地問題，消滅一切封建餘孽，却不推進中國經濟往資本主義道上走，而經過許多階段，用各種經濟的政策，推中國經濟走上非資本主義的道上。這種勢力，我們可以叫做蘇維埃的勢力。說到這裏，托牌取消派連嚴靈峯在內，一定要說，這是斯大林民粹派的思想。現在我們且來詳細解說一下。

中國因爲受帝國主義協同軍閥買辦豪紳地主的壓榨，現在全盤的經濟，雖然各個別部門，有些進展，但是的確處在停頓和破壞狀態之下，農村裏尤其厲害。這樣的情形，是不能『長治久安』下去的。工農貧民羣衆必然，而且已經起來，爲土地革命，勞動條件而奮鬥。而解決民主革命任務，只有他們能擔任。革命成功，建設工農專政。

他是帝國主義的死敵，必然要打倒帝國主義。工農專政的階級性，是不能幫助國內發展資本主義的。倘中國幼弱的工業，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還是要遭資本帝國主義滅亡或支配的（如土耳其）。所以只有經過各種經濟政策，導引中國全部經濟走向非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帝國主義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必然結果。

什麼叫做不平衡的發展呢？古今中外，世界上的經濟，不是同時發展到一樣的程度。在中國北方有了部落社會的時候，南方正可以還存在着半猴子的羣。在英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美洲還是部落的社會。在英國已經是帝國主義經濟的時候，美國還在發展工業資本。所以，某一個國家某種經濟條件先成熟，另一個却落在後面。政治條件亦是這樣：有的是資產階級共和國，有的還是封建勢力領導的帝國。因此，某一國可以先成熟革命條件，起來作革命，而另一國却落在後面。法蘭西大革命，比德國革命在先。俄國已經成功無產階級革命。既然無產階級革命成功，那就創立一種條件，可以建設社會主義。

這種不平衡的現象，不但各國間存在，而且各部門生產中也存在。最明顯的，就是工農業的不平衡。同時，進步的速度也不平衡，優勝劣敗的地位也時常變更。德國資本主義後發展，在戰前却要趕上英國。美國在戰後，步步的侵佔英國的地位。意大利現在又新興起來，要爭地盤。這是因為後進的國家，可以立即應用最新的技術

，來進行生產，所以發展得快。而先進的企業，却有許多舊設備，不能一下就毀去。英國在未用機器以前，手工場已經發達到極精細。一枚繡花針，就需要經過七十二番手續。所謂機器的生產，就不過是機械的動力，替代人工的動力罷了。然後機器逐步的進步。可是中國就用不着經過這樣時代，一下子就可使用最新的器。所謂帝國主義經濟把世界打成一片。因此，對落後的場所，就發生促進的影響。這種情形同時却更促進不平衡的局面，更促進不斷的衝突。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到帝國主義時代，特別表現得厲害，成爲發展中主要的定律之一。後進的國家，因爲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不但可以而且必然要趕過先進國（德英，美英），而且越過一種以至幾種社會形式（當然是經過過渡的階段）。帝國主義打入非洲，設立墾植場，非洲部落社會下的土人，就變爲資本主義墾植場中的奴隸工人。蘇聯北方游牧，捕漁的民族，經過蘇維埃的幫助，要變成集體畜牧和集體漁場。中國的經濟，在工農專政之後，除非又落在帝國主義掌握中，那末工農政權從此消滅。不然，就是實行各種政策，經過幾個階段，把蘇聯經濟作爲先例，再靠他的幫助，進到社會主義的建設，不走資本主義化的道路。這是必然的現象，不僅可能的事。

可是這並不是說，工農專政一成立，資本主義企業就一個也沒有了。不。革命是一個政治的行動，是要奪取政權。就用政權做條件，來促進經濟的發展，來解決各

種經濟問題。開始的時候，向帝國主義沒收來的工廠，或反革命的中國資本家的企業，甚至必須出租或拍賣。但是他和『刮民』政府不同的，就是他以工農階級利益做出發點。他不但不會取消二五減租，還要下令沒收地主土地，不但不會壓迫罷工，還要幫助工人管理工廠。國家必須設方法來調節生產。一方面抵禦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使生產向一定的方向發展。托牌取消派，說這是民粹派的主張。這十足是拿『非資本主義發展』這幾字，用拆字的方法來哄人。有人把共產主義四個字拆開，說共產就是把產共一共。你有一百萬家當，讓四萬萬同胞來共一共，每人共到二分半大洋；你有一個老婆，我來共一下：你一夜我一夜，或者你先睡我後睡。這是最下流，最沒有常識的騙人混蛋話。民粹派說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可以發展社會主義，是非資本主義發展。你說循着蘇維埃路線來發展經濟，就是非資本主義發展，大家都是『非』，所以你就是民粹派。其實，民粹派的主張是怎樣呢？

從前俄國有一種公社，是像古代農村公社一類的東西。但是後來裏面起了分化，有貧農富農中農的分別，內部經濟上完全不平等。而且地主利用這種公社，用不着挨戶收租，叫他們一起合繳。在公社中分擔租額時候，貧民受種種欺侮。而且爲要交租，土地根本不能放棄，放棄了還要交租。民粹派人却說這種公社，是原始共產社會的組織，內部完全平等。想利用公社來建設社會主義，跳過資本主義。其實資本主

義分子，早已侵入進去了。

九二

八千里呢！

大家試拿來同我們的蘇維埃化比一比，那簡直不只差十萬

這種蘇維埃化的可能，比殖民地化的可能要大。爲什麼呢？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使中國殖民地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戰後蘇聯的存在，使帝國主義削弱，又使他不容易赤裸裸侵略殖民地。帝國主義相互間矛盾，現在愈複雜，愈激烈：譬如戰前有德國要爭雄，那戰後，德國復興，意大利新興，美國爭奪世界經濟領導權。他們誰也不肯放誰。帝國主義因爲勢力範圍縮小（蘇聯，殖民地自己發展工業，競爭者增加。），所以經濟上表現長期疲態，就要用合理化等進攻工人階級。而現在又有大恐慌，工人就起來反抗。這都促進帝國主義的滅亡。帝國主義發展範圍縮小，誰都想爭殖民地。英國獨霸的印度，美國尙且要打進去，何況中國向來是好幾個『老板』侵略的，誰肯讓誰呢。所以借一筆債款，築一架無線電台，就有許多『友邦』，你爭我攘，需得到什麼『諒解』。而且帝國主義扶植封建軍閥，不但是你擠我們大家都要自己的勢力範圍擴大。這樣又弄得中國不統一不太平。在這種時候，帝國主義又怕投資，恐怕損失虧本，沒有着落，拉不到債主。所以就不敢投資，需要一再參觀，攷察，談判，攷慮等等。現在美國銀借款問題，就是一個例子。雖然，我

們知道，他們背地裏是雙方而求之不得，也許暗地裏，非正式的正在進行。可是『觀望』究竟是事實。加之以現在工農運動高漲，蘇維埃區域擴大，不但使他們寒心，而且阻止他們發展。工農貧民必然的反抗，是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致命傷。

所以蘇維埃化是帝國主義世界經濟不平衡發展必然的結果，是要戰歷所謂殖民地化的。

嚴靈峯說人家保持『不動』的觀念，把主義看做『教條』。他不懂得『世界經濟有機整體』之下的不平衡發展，不懂得整個世界經濟是不能跳過一個階段，而其中一部分，一個國家，是可以經過過渡形式，越過一種社會形式的。像他才是形式主義者，把馬克思學說，當鈔條用。現在土地革命沒有完成，而土地問題立刻需要解決，而且可以由工農自己起來解決。而這種革命起來，同時却解決不了工廠國有，企業社會化的問題。那末，照他的『動』法，却要革命的民主性『動』一『動』，叫他做社會主義革命。可不知道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企業社會化的革命性質，不知又要『動』到那裏去！開一開玩笑：大概叫做『共產』性罷，

我們說，蘇維埃化要克服和終止殖民地化。可是我們不是一個定命論者。我們絕對不是說：殖民地化一點也沒有實現的可能，天生只有蘇維埃化。我們所說的，第一，最後的勝利，是屬於蘇維埃。殖民地化也許有相當的進展。我們並不擁護殖民

地化的理論，這是右傾取消派的理論。我們認為殖民地化，也是一種主要的勢力，要推動中國的社會：『誰勝誰』的問題，是存在着，是在鬥爭中來解決的！這就是我們了解兩種勢力的觀念。

當然，我們並不是說，中國發展中，只有這兩種勢力。其他的力量還有，而且自有他們自己推進的方向。不過這兩種是基本的，主要的，其他都是次要的，附屬的，跟着這兩種變化而變化，同時當然也能影響這兩種力量。好像俄國的發展，列寧曾經分析過有兩種路徑，一種是普魯士傾向，一種是美利堅傾向。中國因為處在戰後帝國主義的時代，所以不能死板的抄襲俄國情形，應該具體化，特殊化起來。這就是我們提出這兩種勢力的所由來。

中國地主和資產階級，不會解決農村問題：他既沒有普魯士式的大地產，也不能像斯托柳賓的依靠富農。只有農民受無產階級領導，自己起來才行。實行土地革命，是和推翻封建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統治分不開的。而中國土地革命和反帝國主義鬥爭，又是一件任務的兩面，都不能任意拆開來幹。這當然也不是說，工農專政一成立，馬上就把外國工廠一下子沒收，領事館都一例搗毀。不！革命是奪取政權的行動，當然要看具體的環境，有計劃有步驟的，根據工農的利益，真真動員數千百萬萬民衆的力量，引起國際無產階級一定形式的幫助，來完成我們歷史的使命。

托牌的嚴靈峯說：『非每次經濟危機，每次內戰爆發，都是革命局面。』我們說：『每次經濟危機，每次內戰爆發，都是統治階級及其經濟暴露弱點，表示動搖，可以做革命進攻的時機，尤其是在戰後帝國主義第三時期中經濟恐慌和軍閥混戰的時候。革命的導火線，連國會內的風潮都可以充當。』我們不像他們那樣坐等革命飛來，頌揚帝國主義美德，贊助資本主義脫離恐慌，掩護『國民』政府的半封建性。我們看到帝國主義的動搖，封建餘孽的將倒，羣衆革命運動的高漲，應當組織，組織，組織，動員，動員，動員羣衆。當然不學立三主義的一味抓住幾個人盲動！其實立三主義，不了解不平衡理論，混說世界經濟是整個體，倒是嚴先生的理論的同鳴者呢！

……立三同志的說法，以爲一省幾省的勝利，直接就是全國範圍之內已經成熟的革命形勢，這種說法把國際執委和中國共產黨的估量事實，一下子都推翻了——這些事實是：中●國●封●建●軍●閥●的●割●據●，●帝●國●主●義●的●瓜●分●中●國●，●中●國●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革●命●運●動●發●展●的●不●平●衡●。

——摘錄共產國際來信

紅旗週報

第六期增刊

四月十八日出版

目次

今年的五一節

資本主義國家的五一節

社會主義決勝的一年

建立下層統一戰線問題

京漢路上紅軍的勝利

共產國際爲聯共黨內問題致各國共產黨的信

革命軍隊與革命政府

蘇聯的五一節

關於『金貴銀賤』與無產階級運動的幾個

問題

(澤民)

一 『金貴銀賤』的原因

自從一九二九年一月起到現在，上海標金的價格，從三百四十多兩漲到七百九十兩。在兩年之內，銀子和金子的比價相差了恰恰一倍光景。跟着這個，物價騰貴，工人階級的生活受到空前的痛苦。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者』們，當然是不會根據工人階級的利益，對於這樣重要的現象來加以正確的分析的。可是工人階級自己却必須有明確的了解，然後可以提出正確的階級要求，不致於受資產階級所欺騙。

爲了這個目的，毫無疑義，工人階級必須首先明瞭金貴銀賤的原因。

資產階級在這個問題上給了個什麼答覆呢？他們的答覆是：

(一)因爲上海存銀太多了。這當然是笑話。上海不是產銀的地方，存銀太多，必有來源。爲什麼銀子都擁到上海來了呢？資產階級祇看到上海的巨額存銀，壓低

了銀價這個事實，却不知道去找牠的原因。這樣，當然不能算是一個答覆。

(二)他們又說因為印度安南等殖民地國家，現在都改用了金本位制了。印度的農民和地主都喜愛把錢窖藏起來的。以前用銀，他們藏銀子，現在用金，他們改藏金子，藏銀流出，所以銀價跌落了。這個話是有相當的理由。但是夠不夠呢？不夠，不夠。為什麼？因為銀子的價格是隨着銀子的價值來決定的。銀子的價值是由於銀子的生產技術來決定的。如果銀子的生產技術沒有什麼改變，那麼銀子的價格不過暫時動搖一下，依然回到原來的高度，決不像現在這樣一直往下跌到這樣大的程度。因此他們又說：

(三)因為銀子生產過剩了。現在生銀大半是銅錫鉛等金屬品的副產物。近來電氣事業的發展，使銅的需要增加，於是銀子的生產就增加了。『供過於求』，所以跌價。這裏我們看見他們觸到了一點根本的地方了，就是銀子生產的技術有了變更。可是這些資產階級却不在技術的基礎上去着想，單在生產的多寡上去着想，這又是錯的。如果真正是技術上沒有改進，單是生產得太多了，那麼『供過於求』的結果，必然跌價，跌價的結果，必然有許多銀礦破產，於是銀子的生產減少了，銀價又要回到原來的高度，決不會像現在這樣跌法。所以我們的敵人在這裏就是觸到了比較根本的一點，可是他們逃避了應做出的結論。

什麼是應當做出來的結論？就是：銀子作為銅的副產品，是技術上的一大進步，由於這個，生產一兩銀子所需的勞動時間根本減少，價值低落了，所以銀子的價格就一去不回頭的低落下去。

資產階級『學者』們不肯說這句話，因為他們害怕工人階級知道了這個真理，怕工人階級明白了銀價跌落物價高漲不是暫時的事，而是長久的事，就起來鬥爭，要求增加工資。

現在的事實是這樣，銀子的價值的確因為技術上的進步而低落了，將來即使價格上可以稍為回漲一下，也決不會回到原來的高度的。工人階級永遠不能再希望有物價重復低廉起來的一天。

不過，單像上面那樣去了解『金貴銀賤』的原因，却是十分不夠的。因為我們只是從資產階級口裏所已經說出來的話中間，去找得了一些原因，却不曾從他們所沒有說的事實中去找求原因。要知道，資產階級是永不肯向工人說實話的。因為他們要來欺騙工人羣衆。

試把上面我們所認為最根本的一點來仔細研究一下。

不錯，因為銀子是銅的副產品，所以價值低降了。可是試問這種技術上的進步，是不是現在才廣大採用到工業中去的呢？不是！用電氣分解去生產銅，順便得到了

銀子，這種大工業發展了也已經十多年了。而且在這個時間內，世界銀子的產額，據資產階級自己的調查，並沒有增加。就是拿現在講，現在銀子跌價跌到這樣，可是世界的銀產額也依然沒有增加，同時也並沒有增加出多少銅礦廠來增加銀子的副產量。這樣看來，這種技術上的進步，還不是目前金貴金賤的直接原因，而僅僅是一種潛在原因。

爲什麼說是『潛在的』原因呢？

比方是這樣，有一百個產銀的礦，其中五十個是用水銀去採礦苗中的銀子的，是舊法。還有那五十個是以採銅爲目的，而銀子是副產品的。一百個銀礦共總產銀每年一百萬兩。現在每年對銀子的需要也是一百萬兩。那麼，銀子的價格不會跌下去。

明兒商業衰了，銀子只要五十萬兩了，價格跌落，那時先關那些礦的門呢？自然是先關那些用舊法採銀的礦，因爲他們的成本貴，不能賺錢。這樣，新的價格就依照新法的銀礦的成本費做基本來決定。於是這些銀礦中所生產的銀子的價值就決定銀子的價值。那時我們說：現在銀子生產的技術基礎變動了，以前是舊法舊法的銀礦一齊開工的，現在只有用新法來開採了。從比以後，銀價一跌，就再不回頭，沒有回漲的希望。這樣看來，可見，那五十個新法的銀礦雖然早已存在，可是一直要到後來才能夠降銀價，因此我們說，這種技術上的進步，在最初只是銀子跌價的『潛在的』原因。而

商業衰落，銀子需要減少，却是直接的原因。

現在的情形正是這樣。銀子的生產額現在同過去一樣，銀子的技術進步也早已有了，可是銀子老早並不跌價。直到世界經濟大恐慌起來，商業衰落，需銀減少了，那些用舊法開採的銀礦紛紛關門，於是銀價被那些作為銅礦副產品的銀子的價值所決定，而跌價風潮突然爆發起來。

中國印度安南等殖民地國家，都是用銀的國家。在帝國主義的剝削之下，商業衰落。尤其像中國，帝國主義的工具國民黨軍閥在一九二八年起連年大戰，商業幾乎完全停頓，農村經濟大規模的崩潰，演成一九二九至三〇年慘到極點的大飢荒，農民無米可賣，也無錢可買東西吃，這樣，銀子自然多餘出來了。商人們手裏拿了幾百千萬的現洋無處可用，銀價自然要跌。這是一個原因。

但是這種殖民地的經濟崩潰，不單使流通的銀子需要減少了。同時并且使窖藏中的銀子也流出來了。世界帝國主義的剝削和世界農業恐慌，不但使千萬小農民破產，并且使許多地主也破了產。農民固然把積蓄的銀子一齊拿出來買命，地主也只能把窖藏起發出來還債。中國，印度，安南等處都如此。這樣大批窖藏中的銀子都湧出來，使銀子已經過剩的流通市面，更加有銀子太多的現象，而銀價更被壓低。不單如此，中國的軍閥和革命使地主不敢再住在鄉間。土地是搬不動的，多半是

帶了銀子到上海香港等大都市去『避難』。不單中國，印度安南以及其他許多殖民地，到處有農村革命暴動，因此地主逃到城市成了最普遍的現象。這樣又因為政治的原因加速窖藏的流出。

而這些銀子自然都集中到上海之類的都市去。前面說，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肯說出銀子所以集中到上海的原因，只把銀子集中上海來做金貴銀賤的原因，是他們的一種欺騙方法，現在可以明白了。銀子跌價在這種原因之下，乃是第三時期帝國主義加緊剝削和掠奪殖民地的結果。

依照經常的情緒，商業衰落，市面上流通的貨幣過剩了，銀子是走到窖藏中去的，現在剛剛相反，從商業流通界和窖藏一齊向外排擠，擠來擠去沒有地方去，銀價自然格外迅速的跌落。這又是第三時期殖民地經濟的一個特點：

在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世界經濟恐慌的結果，用作窖藏式用途的（如打首飾等）也減少了，用作工業原料的（如照相，電影片等等）因為經濟衰落，也減少了。所以在全世界的範圍內，銀子的需要又減少。

這樣，全世界銀價壓低的結果，根本影響到銀子的生產技術基礎。凡技術低劣的都關了門，他們再不來決定銀子的價值，而銀子的價值却由那些技術甚高的，就是主要的把銅礦中的副產品銀子的低廉價格來決定，而銀子的價值遂一蹶不振。

假定以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稍稍和緩，商業又恢復一些，那時怎樣呢？那時候，即使有人又來投資銀礦，他們也不會採用舊法，而必然採用最新的技術了。所以銀價將來即使會稍稍回漲，可是永無完全回復的希望。工人階級吃這個虧是再沒有蘇鬆的時候的。

凡此一切，資產階級都封起了口不講，因為他們知道一讓工人們知道了，工人們就完全失望要起來鬥爭，所以他們故意把銀價變動說得異常之渺茫難測，好像完全有神祕的力量在操縱着，今兒大跌，明兒也許又大漲了，這樣就好使工人階級莫明其妙，只盼望將來。

不過『金貴銀賤』不單由於銀賤，而的確又因為金貴。金貴和銀賤不同的，就是，如果銀子跌價因為價值降低，金子漲價却僅僅因為價格提高。

金子的生產，在技術上並沒有什麼變動。價漲的原因主要的是有兩個：

(一)是世界經濟恐慌的起來的時候，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盡量的吸收現金，為的防恐工業破產，帶累銀行倒閉。

當一九二九年底世界金漲特別加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二)是世界帝國主義國家積極準備第二次世界帝國主義大戰和進攻蘇聯的反革命戰爭，所以也拚命的吸收現金。大戰一起來，每個國家都要向別國大批購買貨物，現金

有貯是特別重要的。他們不但爲準備戰時需用，並且爲在戰爭之前，預先破壞別國的金融基礎，也拚命的爭着吸收現金。

爲這兩個原因，所以歐洲各國都盡力的由虛金本位完全過渡到金本位制。爭奪現金成爲目前帝國主義國家間極大的鬥爭。法國積蓄了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黃金，企圖吸空英國英格蘭銀行的現金，英國反過來用外交向法國交涉。這樣鬥爭的結果，自然會把現金價格提高，而金貴銀賤的風潮更加猛烈了。

二 『金貴銀賤』能够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麼？

『金貴銀賤』使各種外國貨的進口，都因爲原來是用金價計算的，合到銀價來賣給中國人的時候，價格都合算得非常昂貴了。這對於中國工業發生兩種相反的影響：

第一，是工業製成品的輸入因此減少，使各項中國自製品勃興。許多小規模的日用工業品工廠，如製帽，製革，化妝品，橡皮鞋，醫藥用品等等都發展起來。最近兩年來，上海一地添加了不少這類的工廠。

『金貴銀賤』彷彿是天老爺對這班懦怯的，不敢得罪『洋大人』，不敢關於提高關稅的事認真的放一個屁（他們用關稅自主的宣傳欺騙羣衆，倒已經兩三年了）的中國資產階級十分垂憐，特地弄這麼一個機會給牠，用不提高關稅的方法，增高了中國資產階級對

外國輸入商品的競爭能力，在去年年底竟有了很滑稽的事，就是在中國紗價大跌的時候，中國的紗竟趁着『金潮』往日本輸出。因此，一部份的資產階級莫不額手稱慶，說是天幫助了他們。於是他們定到替自己描畫出一個異常可愛的前途。大呼『金貴銀賤正是抵制洋貨提倡國貨的機會！』這種呼聲，逐漸也成爲南京政府公文中的用語了。

可是，另一部分的資產階級却吃了金貴銀賤老大的虧。那是那些工業資本公司專門倚靠着外國原料來生產的。紙烟業，火柴業，是其中最顯著的。這兩項工業在一個時期裏面，倒了許多大工廠，幾乎全體破產了。其餘如紗業，依靠印棉美棉的趨勢日益增盛，也在大聲叫苦，紗業的所以能夠維持，是因爲牠們用外棉這一部分的，而且同時世界棉花跌價，也幾乎和金價的抬高一樣迅速。由於中國飢荒和戰爭的結果，上海甚至天津的麵粉業也依賴洋麥去生產，所以麵粉業也受到打擊。而這些工業正是民族工業中最主要的企業。

所以算起總帳來，中國民族工業還是受惠於金貴銀賤的少，受虧的多。

當然，如果金貴銀賤能夠長久繼續下去，銀價不斷的跌落，金價不斷的上升，那麼，外國貨的輸入可以長久被阻止着，中國工業的發展可以長久的發達下去。就是原料方面，明兒亦可以改到完全採用本國的原料。這樣，中國資產階級『利用金貴銀賤以發展實業』的甜夢就可以做得成功。可惜，傻子亦知道決沒有這樣的事。

銀價是終究要穩定起來的。外國商品的大規模拋入中國市場是必定要恢復的，中國的民族工業在這裏是找不到前途的。

下面來比較仔細的攷察一下

銀價的跌落，貨價必然的比例上升，這是經濟學上的定律。如果銀價一跌落，貨價立刻按照比例上升，那麼中國的工業得不到任何好處，這是很明顯的。但是實際上却不是這樣，貨價的上升往往比銀價的下落來得慢些。這樣就暫時產生出中外商品價值平面的相差來了。中國的工業現在就在利用這一點相差，去和外國的商品作有利的競爭。

同時，這種相差的所以發生，又有以下的諸種原因：（一）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比工業品更慢，因為農民的落後，窮困，受商人、高利貸者、和資本家地主的操縱等等。（二）工人工資在資本家白色恐怖的壓制之下，上升得也非常緩慢。就是利用這兩種相差，所以中國工業品，可以在遠低於同樣外國商品價格以下的平面上出賣而獲得厚利。不過，這樣的情形是不會長久的。農業的生產以一年為週轉期，工人的生活標準一半跟農產品的價格為轉移，一切原料人工都逐漸上升的結果，物價終於要漸漸上升而達到與幣價跌落相比例的平面。現在全國已經是到處一片漲價聲了。銀價穩定以後，漲價一定繼續不止，而很快的便要達到這樣的高度，使外國的商品和原料的輸入重復

變成有利。那時候外國商品又要復佔一切市場，新興的各種小企業又要大批的破產了。

不單如此，中國的工業中，本來到處有外國資本工廠存在。他們有較優的技術和管理。他們同樣受着金貴銀賤的有利的影響。上海的中國紗廠在最近一個時期內僅能維持，上海的日本紗廠却大獲厚利。最近中國人的厚生紗廠賣給日本人更是明證。從這裏又可以知道，金貴銀賤固然相當的阻止外國商品的輸入，却鼓勵外國資本的移入中國，而增長他們在中國境內對中國民族工業的競爭力量。最近日本在華紗廠大擴充，並時時風傳的日本企業移到中國的說法，都受了金貴銀賤風潮的一部分影響的。最後關於市場問題。金貴銀賤使百貨漲價，無形中幫助一切形式的剝削者增加了對於一切勞動羣衆的剝削。勞動羣衆更加貧困，國內市場更加乾涸。中國的民族工業是倚賴國內市場去生存的，金貴銀賤的影響，最終的還是不利於民族工業。

這樣說來，可見金貴銀賤至今在主要的工業部門中，還只是使中國民族工業破產衰落，同時又不給任何玫瑰色的前途。在去年夏天，當金潮暫時的稍稍平靖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辦的報紙上，已經預先宣告秋天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競爭對中國『屯併』的時期了。這事實僅部份的開始的時候，第二個銀潮再起又中止了。現在帝國主義者正在等候第二個屯併的機會。屯併的意義，依照那個日本帝國主義者報紙說

，是大量洋貨『殺到』中國來，意義是中國民族工業的瓦解，是全中國國民經濟的比目則更猛烈得萬倍的恐慌。而這種大恐慌的來到，毫無疑義要把銀價穩定作為轉灣點之一。

三 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和中國資產階級怎樣企圖來

『挽救』『金潮』？

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南京政府——這些剝削者階級和政府的所謂『挽救』政策，當然不是來挽救勞動羣衆於金貴銀賤的苦痛，而是挽救他們自己的垂危的運命的。

由於金貴銀賤，他們有些什麼事要來挽救自己？

首先就南京政府來講，牠負有巨額的外債賠款，都是用銀子折算成金價去交還的。

現在因銀價跌落一倍的緣故，每年外債賠款本息的交付就要增加一倍。牠必須準備軍閥戰爭，現在正用全力來『圍剿』石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因此需要巨量的偷偷購買軍火，這筆費用，因為銀價跌落關係也要平添一倍了。而這種『意外』的增添，却是在南京政府自中央起，至各省各縣的政府機關的財源『羅掘俱窮』的時候。如果不能迅速想一

個辦法，那麼破產即在目前。而因為現在南京政府的國庫，事實上已經差不多變成了中國銀行資本家的私庫，所以這些銀行資本家是特別關心的。

其次、拿南京政府下面的各鐵路來講（這在戰爭中的作用自然是很大的），現在也因為銀價跌落的緣故，是在歷次戰事以後又加上了新傷。收支最良好的京滬鐵路尚且因此虧空一千多萬無法抵補。因為這些鐵路大概都負有重債，債主都是外國資本家，償清都是要用銀兩折算成金價的。

然後是一般的金貴銀賤對於中國最大多數中等資產階級，以至大資產階級的直接的破產威脅（關於這一點上而已經分析過了）。他們希望用一些什麼方法去穩定銀價。凡這些資產階級各階層的要求，都反映在南京政府的各種政策裏面。

他們採用些什麼方法來挽救自己？辦法是幾乎等於零。實際上，自己站在資本主義原則上的資產階級，當然沒有辦法可以想得出來的。

去年八月南京政府曾經頒佈了禁金出口，禁銀入口的命令。這個禁令在一部分的資產階級中間，早已批評是沒有用處的。『因為』——據他們說——『銀子跌價既然是世界市場上的問題，那麼一個國家來想法是沒有用處的。』據我們的看法，銀子既然同時又是根據於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而經內地的貯藏中流出的，那麼禁銀入口更是毫無用處的。果然禁令行了半年，毫無實際的効力。實際代表上海和浙江銀行資本家的

財政部長宋子文之所以頒佈這個禁令的目的，並不在真真阻止銀價跌落，而在便於操縱銀價，使這些銀行資本家能夠從中獲取標金市場的投機利益。

此外就是採用金本位的空喊了。由外國顧問甘末爾所計劃，中國的『經濟學者』（？）馬寅初博士所擁護的『中國逐漸採用金本位幣制法』，終於只是紙上的空談。南京政府並沒有力量，也沒有決心去做任何實際的準備實行金本位制。爲什麼原因？因爲在南京政府裏面佔得重要地位的，是銀行資產階級，他們本是利用了金貴銀賤的潮流發了財的。他們對於南京政府財政破產的前途，雖然很有些害怕，可是『逐漸採用』金本位制，却救不得目前；而目前的救急辦法，却很可以用大借外債來解決的。

然則他們爲什麼要來宣傳採用金本位制？那是一種策略，一種欺騙，一方面來安慰那千萬正在破產中的中小資產階級，一方面來欺騙那在陷到更深的水火之中去的勞動羣衆。

至於南京政府自己本身的（藏在他們幕後面的）『救濟』辦法，却是一個非常可恥的『賣國』的計劃，用我們自己的話，就是投降帝國主義的，幫助帝國主義者來殖民地化中國的計劃。這種計劃一點也不是從穩定銀價的觀點出發的，這個他們是讓資本主義的盲目的法則去自然地解決了。這種計劃，甚至也不是從發展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觀點出發的，因爲南京政府已經不十分是一個中國民族資本利益的代表者，而是國際帝國主

義（首先是美國帝國主義）利益的代表者了。是一種爲了外國財政資本，和中國一部分資產階級（首先是銀行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怎樣來對外國由向中國出口所遭受的損失給與抵償，更加殖民地化中國，和怎樣渡過南京政府的財政難關，裝飽中國銀行資本家的錢袋；——這樣，他們是要鞏固自己來壓倒中國工人和農民的蘇維埃運動。

在這裏，對於破產者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羣衆，他們是企圖用關於紅軍和蘇維埃區域恐怖的造謠宣傳去鎮懾他們，使他們服從南京政府的政策。至於大資產階級中不利於銀價跌落的部分——一部分民族工廠主——那他們是早已逐漸與銀行資本和外國財政資本混合生着，不能形成獨立的鮮明的政綱了。

這種大借款（是銀借款）據報紙所傳，說是有十萬萬盎斯。這筆巨額的生銀送到中國來，絕不是爲抬高中國的銀價，而是相反，爲壓低中國的銀價的，對於沒有經濟學知識的人，也應當是十分明顯的。大借款成立以後，中國必然有新的銀價跌落的潮流，新的破產，和新的困窮。這自然是中國一部分的資產階級所需要的，因爲他們可以從新再一次來降低中國工人階級的實際工資，加重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

對於帝國主義者，這筆大借款將在短時期內造成中國銀價和國際銀價的剪刀式的相差。中國由於大批生銀進口的緣故，銀價更跌了，國際市場上却因爲借出了這大量生銀的緣故，銀價有相當的回漲。利用這個差數，他們又可以從買中國生銀賣到世界市

場上去的方法獲得大利。

一一一

環繞於這個大借款的週圍，帝國主義列強自然是進行着鉤心鬥角的競爭。由美國單獨借款呢？還是由國際銀行團借款呢？環繞着這個問題，中國各派的地主資產階級和他們在南京政府中代表，也在進行着殘酷的鬥爭。

代表着英國的由國際借款的主張的胡漢民被免職了。美國的企圖是乎是勝利了。國際中間的鬥爭如中國軍閥新戰爭的形勢於是更加緊張起來。這樣大借款將來怎樣分配？中國統治階級中的各派也在圍繞着這個問題作殘酷的鬥爭。

一部份的資產階級說：應當用到發展實業上去，於是他們引了『孫中山先生』的地化中國的『理論』的根據了。自然，孫中山的這個計劃，現在正好是帝國主義殖民級，現在已經除了做帝國主義的經理人，來分沾餘潤以外，沒有別的出路了。而中國的地主和銀行家，却主張主要的應用於『剿滅匪共』。當然，壓倒紅軍和中國蘇維埃運動，現在是所有中外統治階級共同的利害。這兩種要求，不能成爲完全對抗的要求，所爭的是分配中間具體的分量問題。而這中間的鬥爭，現在也正在發展了。然而十萬萬農工農羣衆身上的痛苦來講是很大的，對於南京政府的

需要來講，却是很小的。不多幾時就可以化完，就可以再談第二次借款。

如果南京政府一天不滅亡，那麼借債生活將不斷的繼續，這樣，牠愈加積聚牠身上的債務，愈加喪失其對外的一切獨立性。

然而這裏，却絲毫找不到對於銀價問題的救濟。南京政府的『救濟』政策，是更加加深中國銀價問題的恐慌，而由中國的大資產階級與大地主和帝國主義者來公共分配金貴銀賤中的投機利益。

至於金本位制，將來在各種有利於帝國主義者的條件下，是可以建立起來的。印度安南不是都因為英國和法國財政資本的需要，而改用了金本位制嗎？然而，目前他們對於中國，却暫且還不需要這個，他們不能把爲準備大戰而積聚着的現金，來給中國建立金本位制。

四 中國無產階級對於金貴錢賤問題的立場

金貴銀賤首先是對於中國勞動羣衆的生活，給與了絕大的打擊。農民因為農民自己的家庭手工業破壞，購買城市工業品日多，這一切都漲價了。而農民自己的農產品，却因為仰賴於商人的轉售，依然用極低的價格出賣，讓最大部分的利益給這些商人賺去。所以金貴銀賤增加了農民所受的剝削，加速了農業經濟的崩潰。

工人階級因爲日用品一切都貴了，而資本家對於工資却不肯增加。這樣，金貴銀賤是幫助資本家降低工人的實際工資。

最近兩年來，銀價的可怕的跌落，是繼續不斷的。物價指數跟着上升，工人即使每天爲工資而鬪爭，每天獲得相當的勝利，也還是趕不上實際工資降落的迅速。可是在這過去的兩年中間，資本家在蔣介石南京政府的白色恐怖幫助之下，不但不會增加人工工資，并且藉口工業破產來減少人工工資。有許多工廠的罷工，是因爲資本家對工人進攻而引起的。現在在第二個銀潮來了以後，顯然物價的高漲用加速度進行了。一片漲價聲中間，提出了工人階級爲保持他們那餓死線上的工資而鬥爭的任務。

我們的口號應該是罷工，罷工，罷工，爲增加工資而罷工！（當然，工人階級在目前階段的全部要求絕對不限於這一項；在南京政府作垂死鬥爭，進攻蘇維埃革命運動的時候，我們的進攻路線是『爲蘇維埃政權而鬥爭』。可是忽略了金貴銀賤下工人階級關於工資的切身要求，和許多其他經濟上的要求，如工作時間，反對合理化的鬥爭，關於女工青工的許多特殊要求等等，却要走到以『左傾』辭句掩蓋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消極的立三路線去的！）

現在的資本家很巧妙的應付着工人。一旦發現工人有什麼鬥爭起來，往往立即把這些最初的要求答應了，先等工人的憤怒平靜下去，然後再慢慢設法取消他所答應的條

件。這固然證明資本家欺騙手段的進步，同時却證明工人階級更應當由澈底爲工資而作進攻的鬭爭。

這是一種辦法。

此外我們應當反對大借款，不論是金的銀的！因爲這些借款只是加深中國的殖民地化，加重中國勞動羣衆的窮困與負擔，而是準備着更深的經濟恐慌的基礎。因爲這些借款，是用了去攻打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延長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壽命，替帝國主義列強解決中國政府還外債的問題，同時外加上許多使中國殖民地化的條件的。這種大借款，不能救濟『金貴銀賤』對中國工農羣衆的苦痛，反而加深這些苦痛。因此我們必須反對大借款。

我們還應當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償付一切外債本息，都拿來充作工人階級的救濟金，尤其是失業者救濟金。應當要求南京政府真正禁止物價的高漲，不要只是一道空的命令來掩飾。

這些都不過是暫時救急的辦法。南京政府是即使這些辦法也不會實行的。至於根本的辦法，那唯有去掉上面所說的這些原因，那就是必須根本推翻帝國主義者和地主軍閥資本家的統治。現在的金貴銀賤，既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劇烈爆發中，資本主義生產矛盾之一種表現，所以站在資本主義原則上的中國和外國資本家及地主資本家聯

合政權的南京政府，決不能解決這種問題。正像一個人自己提不起自己的身子一樣。只有走向社會主義前途的蘇維埃革命，才能夠將這種資本主義原則打得粉碎，同時使牠的一切矛盾都消滅，金貴銀賤的這種現象才可以根本消滅。蘇聯已使用半紙本位的國家，逐漸國內一切生產和分配更有計劃更有組織時，就可以完全廢去金錢。只有學蘇聯的榜樣，才可以根本解決幣制問題。

布爾塞維克的進攻和機會主義的新活動

啓凡譯

蘇聯共產黨揭露了瘦草夫和洛明那瑟派別的小組織的反黨工作，而很快的打碎了這種企圖。這些小組織——雖然他們的『幹部』很可憐，可是還在互相結合聯盟，來做反對黨的派別鬥爭。這兩個小組織聯合起來，反對黨的列寧政策，反對黨的領導，他們是有共同的政綱的，這個政綱，一般的講來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政綱。自然，這個聯盟的意義，並不決定於那兩個小組織的成份以及他們和黨部的線索——那成份和線索是充分的微小的。這個『左』右聯盟的『思想』和『歷史』，更加提醒我們：黨要實行強有力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的任務，尤其是要反對直到現在還是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領導的右傾的主要危險——雖然他們在第十六次大會上已經有過口頭上的聲明。

『左』右聯盟的路線和政綱，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切主要問題裏面，都是和黨的政策互相對立的。

瘦草夫和洛明那瑟聯盟的整個政綱，是對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進攻目前時期之中的困難發生恐慌，而形成的，是根據於對着階級敵人投降的政策，這種政綱表現『左』右

聯盟是要趁着困難來投機。『左』右聯盟政綱的基礎，是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目前階段，對於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對於我們困難的性質，都有和黨絕不相同的了解。

五年計劃之中已經過去的一個時期，有了極偉大的成績，這些成績，在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之上，特別來得顯露。蘇聯達到了人類歷史上空前的經濟發展的速度。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之後的時期裏，農民羣衆之中發生了歷史上偉大的轉變——轉變到社會主義方面來。蘇聯共產黨現在正在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的基礎之上，實行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蘇聯共產黨說，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是可能的這句話，成了幾千萬工人農民經驗上的成績，實際生活上完全證明了。『我們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的時期，因為雖然離着社會主義社會的完成和階級分別的消滅還很遠，可是，整個國民經濟裏面的一切經濟動力，都在社會主義部分的掌握之中了』。（斯達林）

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進攻開展着，可是，這並不是沒有困難，沒有強烈鬥爭而平平穩穩的進行的。階級鬥爭現在達到了很大的緊張。我們的困難是階級鬥爭的不可避免的困難，是生長之中的困難，是我們勝利的進攻之中的困難。瘦草夫和洛明那慈聯盟的政綱，就根據於完全不了解我們困難的這種性質的。因此，這個聯盟對於現在的經濟狀況，就有恐慌的投降政策的估量。『左』右聯盟，和其他一切機會主義的小組織

一樣，總有這種恐慌和灰心的悲觀主義。每一次的反對派總是這樣開始的，這樣，他們就找着理由來攻擊黨，來要求變更『不正確的』路線。瘦草夫重複一切反對派所講過的濫調，暴露他自己的『分析』和恐慌的根源，他說：『我們任其自然的，很盲目的，無組織的走進了一種經濟現象，這種現象是現在全國警心討論的對象，部分的說來，亦就是大家在排着隊等待買東西的時候討論得很深刻的那些現象，——固然他們是討論得不正確』。『左』右聯盟對於前途亦是描寫得很黑暗的。照他們說起來，將來的一年並不是五年計劃之中決定勝負的一年，並不是新的高漲和生長的一年，並不是開展的勝利的社會主義進攻的年份，——在這社會主義進攻的旗幟之下，整個的黨，整個的工人階級正在鬥爭呢，——照他們的意思，將來的一年却是『堅決的去改正已經做出來的錯誤的一年』。這裏，暴露出來：他們對於過去階段的經濟結果和黨的領導，有很誣蔑的估量，完全不了解前一階段的成績，他們慌張起來，沒有氣力了，社會主義的前途也喪失了。這些投降份子，企圖用自己這種誣蔑，來和領導着幾千萬勞動者力爭『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黨所已經得到而無可爭辯的成績，相對抗呢。

蘇聯共產黨堅定着自己的意志，正在克服一切困難，克服一切向前進攻之中的困難，用布爾塞維克的精力打破一切障礙，因為我們的『力量在鬥爭的過程裏而同着革命的生長而生長呢』（列甫），因為我們『困難的本身就包含着克服這些困難的可能』（斯達林

）。而機會主義者現在却要往後拉回去，他們沒有布爾塞維克的精力，而只有市僧的唉聲嘆氣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這已經不止一次了，在一切陡然高漲的時候，機會主義者都是這樣的。

目前時期的特點，照機會主義的估量，就是瘦草夫和洛明那。這種否認蘇聯走進社會主義的時期。這種否認，是機會主義和黨根本不同的地方。這種否認黨對於目前時期的估量，是根據於不了解現在蘇聯經濟生活之中社會主義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直到現在，機會主義過份估量私人資本——瘦草夫所謂『無組織的部分』，他們不看見：雖然有生長之中的困難，然而『整個國民經濟裏面一切經濟動力，都在社會主義部分的掌握之中了』。現在蘇聯經濟之中，社會主義的部分已經有決定一切的意義，這表現於工業極快的發展，工業對於全國經濟的決定一切的影響加強，集體農場和蘇維埃國立農場強有力的發達，蘇聯全國經濟之中有計劃的原則加強起來。『究竟是誰打敗誰』這個問題——究竟是工業之中的社會主義打敗資本主義份子，還是資本主義份子打敗社會主義的問題——已經一般的解決了：工業的社會主義方式得着勝利了（斯達林）。機會主義者不了解現在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他們認為『黨過份估量工人階級的力量』（瘦草夫）。他們不看見：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是根據於農民的主要羣衆轉變到社會主義方面來，以及中農在集體農場之中變成無產階級在鄉村裏的新支柱，他們不看見，這種

政策的轉變有歷史上的意義。機會主義者，在階級鬥爭的劇烈和階級敵人猛烈的抵抗之中，不願意看見蘇聯裏面現在正在進行的，向着完全消滅階級方面的巨大的階級變動。社會主義勞動的新方式極廣泛的發展，更多的羣衆日益引進到國家機關裏面來工作，羣衆的文化程度增高起來，工人和農民之中養成許多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指導幹部，——這些都適當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現在階段。機會主義者却完全不了解這種羣衆之中的變動。

這樣，瘦草夫和洛明那慈這種機會主義者，就又來重新審定我們黨綱之中的一個問題：就是蘇聯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企圖渙散無產階級，『把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前途，踐踏在智識份子的懷疑主義裏面』（斯達林）。

瘦草夫和洛明那慈聯盟的政綱裏面其他的意見——對於許多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問題的意見，——就都是從他們這種對於革命發展現在階段的總估量出發的。而且『左』右聯盟政綱之中決定一切的一點，實際上是拋棄社會主義建設的高度的速度，就是在社會主義進攻的最主要問題裏面和黨的路線決裂。對於右傾機會主義者，『他們不了解我們布爾塞維克式的速度，不相信這種速度，總之是不贊成任其自然的漸進的發展範圍之外的任何東西』（斯達林）——這正是他們的特點。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機會主義

的政綱，在這一問題裏面是要求：減低速度，『縮短大規模建設的戰線』（洛明那慈）。

這個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新聯盟，實際上在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裏面，也站到右傾的立場上去。又來重複那種罵黨的話：說只有行政官廳的『機械的對付農業集體化任務的方法』。機會主義者，假裝着預防黨內重複『左』傾過火的錯誤，而事實上是拋棄利用今年日益踴躍加入集體農場的潮流的可能，拋棄爲着黨的『五年計劃完結時候就要完成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的口號而鬥爭。對於集體農場化的情形以及加入集體農場的新潮流的前途，既然有了這樣懷疑的估量，自然，一九三一年就只是『審查集體農場運動的年頭』了（瘦草夫）。在牲畜事業問題裏面，機會主義者要拋棄黨在牲畜事業之中發展社會主義部分的態度，拋棄爲着發展牲畜事業的國立農場的鬥爭，重複右派在糧食恐慌時期的濫調，重複它們對於解決穀類問題的預言。可是，右派預言家關於穀類問題的預言早就已經破產了，現在新『預言家』關於牲畜問題的預言也一定要破產的。

『左』右聯盟的領袖，自己在慌亂狀態之中，要想找出和黨的路線不相同的路線，他們甚至於提議提高物價的政策。因爲這種提議的緣故，所以『左』右聯盟對於工資問題的意見，就更加顯得是謊騙和錯誤。

『左』右聯盟的破產領袖，也和其他的反對派一樣，企圖裝着『擁護』工人階級的樣子

，要求增高工資，改良工人的給養。自然，他們在這裏完全不提起黨是怎樣爲着增高工人物質生活和文化程度而鬥爭，他們故意曲解事實上的情況：——現在蘇聯的工業強有力的發展，農業集體化而有革命的改造，國內糧食來源極快的增多，這種情形的基礎正在鞏固起來，——所有這些，都是工人和勞動羣衆的一般生活程度增高的根本。現在，失業完全消滅，這正是工人階級幸福的增長的最明顯的表示，——可是，『左』右聯盟裏面的所謂工人階級的『擁護者』，居然完全沒有看見。

『左』右聯盟要辯護自己對於黨的攻擊，竟說出對於黨內狀態的純粹孟塞維克的估量，竟放出對於黨的領導的極惡劣的謊言，對於工人國家也是這樣。現在的反對派——『左』右聯盟，又來重複托洛斯基的老演說，說『國內最主要的不平等是黨內關係的不平等』。他們真正喪失了一切能力，竟會不看見黨的力量，不看見黨的中央委員會能夠領導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進攻，克服極大的困難，日益引起新的幾百萬勞動者來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他們竟說什麼『束縛工人羣衆的有益處的精力』，『假造對於我們缺點的批評』，『對於工人羣衆的主要幹部沒有及時的正確的指示』等等，——『左』右聯盟對於二百萬人的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着工人階級實行『五年計劃四年完成』口號的黨，竟給以這樣孟塞維克的，荒謬得無以復加的估量。

機會主義者誣毀工人階級，說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走上了『小資產階級的投機道路』，

他們說社會主義的競賽是『假衝鋒運動的廣泛的傳播』，是『假造強度的工業財政計劃』等等。機會主義者反映工人階級之中最落後的動搖份子的影響，把他們的『非階級化的習氣和消極情緒，當做全體無產階級的情形』，於是他們自己在無產階級隊伍之中覺着自己已是外人了。

正因為『左』右聯盟脫離了自己的階級和自己的黨，不相信工人階級的力量，所以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機會主義聯盟對於蘇維埃機關的估量，居然會和托洛斯基反革命的謠言相同。蘇聯共產黨正在進行着反官僚主義的鬥爭，而他們不參加這種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反而說國家機關腐化了等等，——這簡直是重複托洛斯基派的謠言。他們因此說蘇維埃機關裏面是『精力衰頹，元氣喪失，沒有創造的建議力，只有官場式的好消息，意志消沉。』（瘦草夫），說『在許多蘇維埃機關裏面統治着對於工人農民的需要和利益的老爺式的封建式的關係。』（洛明那慈）

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派別聯盟的一切特點，他們對於黨的政策的新的一切特點，都和我們革命的現在階段的一切特性密切的聯系着，而且是被這種特性所規定的。

無產階級開展着順利的社會主義進攻——很快的發展工業，發展蘇維埃國立農場和集體農場，剷除資本主義的根源，而要消滅國內的階級分別。最近根據五年計劃的第一二年成績而定出這一特別年的計劃，以及對於一九三一年的大約規畫，正是各方面的開

展的社會主義進攻的計劃。這一年的成績，將要是蘇聯經濟的社會主義基礎更加強有力的鞏固。消滅富農的政策，將要在新的整個區域集體農場化的地方繼續開展下去。

現在無窮盡的力量正在警醒起來，來爲着在城市和鄉村之中建設社會主義而鬥爭。新的社會主義的勞動方式，日益應用到工人和集體農場農民的新的階層之中去。幾百萬新的貧農和中農，在反對富農的殘酷鬥爭之中，轉到用社會主義發展鄉村的道路上去，轉到建設集體農場的道路上去。蘇聯共產黨堅決的工作着：改造工會機關和經濟機關的全部實際工作，真正鞏固他們的幹部，使他們之中有鞏固的『最積極最革命的工人人員的骨幹，排除並且隔離機會主義工會主義官僚主義的份子』（斯達林）。

我們的黨部，爲着要執行新的任務，也正在改造。爲着社會主義的改造而不斷的在城市和鄉村之中做實際工作，爲着列寧主義的政策而開展着兩條戰線上的鬥爭——所有這些，都使二百萬人的無產階級政黨更加團結，使他在羣衆之中的威信更加鞏固，使他對於一切破壞黨的統一的行動，以及修改黨的路線的一切企圖，更加嚴厲的去克服。我們蘇聯共產黨和他的領導，有幾千百萬的無產階級，集體農場的農民，以及鄉村的勞動者的強有力的贊助，並且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同情和贊助。

我們的社會主義發達的環境，我們現在階段的順利的進攻，以及黨的偉大的團結和統一，使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者最近的言論和行動，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響：他們不

敢公開的擁護自己的路線而公開的實行反對黨的鬥爭的鬥爭方式——口頭上說同意黨的政策。因此，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對於黨內問題不講話，事實上不肯爲着黨的總路線而鬥爭。因此，機會主義者轉到兩面三刀的策略，而直接的欺騙黨。因此，瘦草夫和洛明那慈的聯盟轉到他們自己的秘密工作。現在甚至於右傾機會主義也不能不運用『左』傾的空談，來做『革命的假面具』，『塗着花臉，要想用外表的裝飾，使工人注意他們，而信仰他們這種反對派。』（斯達林）

正因爲認識了黨的不可侵犯的力量，所以左派和右派的機會主義者聯合起來。昨天右派還『反對』過左派，還造謠，說全黨和中央是托洛斯基的殘餘。昨天『左派』還『反對』過右派，還說中央委員會是『中派主義』的，是對右派調和的。現在呢，右派和『左派』都在共同的政綱之上互相聯合起來，來反對黨了，——自然，並不因此就消滅了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各自的特點，所以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仍舊是有必要的。然而機會主義的『領袖』，除出呂汀，努西諾夫，加符萊斯基等類的人以外，竟找不着自己的更好的『幹部』，而這一類人，却是黨內不堪造就的一些智識份子，他們如果在別種條件之下，是要成爲另外一個非無產階級的敵視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政黨的份子的。

這樣，黨的強大的發達和鞏固，他的布爾塞維克的統一性，就使右派和『左派』機會主義者要運用那種兩面三刀的欺騙的策略，口頭上承認和黨是同意的，用這種假面具來

掩蓋自己機會主義的行動，走到無原則的聯盟，變成明顯是反黨份子的中心。

我們國內的資本主義的一切力量，猛烈的抵抗各方面開展的社會主義進攻。『資本主義不是一下子就死滅的，他的死期越近，他的抵抗越猛烈』（列甫）。現在的鬥爭階段之上，現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鬥爭的階段之上，列甫的話，比任何時期都要更加適用，列甫說過：『無產階級獨裁制是新的階級反對比較強大的仇敵，反對被推翻之後正在用着十倍力量抵抗的資產階級的最決絕的最無情的戰爭，（雖然資產階級只在一個國家裏而被推翻），——資產階級的能力，不但在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不但在於資產階級國際關係的堅固和力量，而且在於習慣的力量，在於小生產的力量。』（列甫：共產主義的『左派幼稚病』）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工業黨，勞動農民黨，以及其他破壞者），正是對於無產階級爲着社會主義爲着掘盡資本主義根源的這個『無情的戰爭』，用反革命的破壞運動來答覆；富農——就用破壞黨在鄉村裏的政策和工作的鬥爭，以及直接反對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來答覆；官僚份子——就在蘇維埃機關裏的怠工來答覆。

我們國內這些正在死滅的階級的抵抗，得到外面的積極贊助，得到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切力量的贊助。現在階段之上，世界帝國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蘇聯的鬥爭，更加加強起來。世界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革命高漲的生長——蘇聯社會主義的五年計劃的成績對於這個是有影響的，——所有這些，重新又使世界資本反對蘇聯

的鬥爭要應用恐怖暗殺的手段，軍事破壞的手段，幫助反革命黨和破壞者，經濟的封鎖，武裝干涉的準備。的確的，世界經濟危機和衰落的背景之上，我們的發達日益加重我們黨着社會主義鬥爭的國際意義。正因為這個緣故，國外又在發展着反蘇維埃的運動。可是，不應當忘記：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反對蘇聯的鬥爭積極起來，而別方面世界無產階級對於蘇聯的積極擁護和贊助，也在日益加強呢。

蘇聯國內仇敵的抵抗，使小資產階級的動搖，以及無產階級之中最不稳定份子的動搖，加強起來。這種情形不能夠不反映到黨裏面來。我們黨內右傾機會主義，以及一切傾向的力量，都在於『小資產階級潮流的力量』，在於一般資本主義份子，尤其是富農，對於黨的侵犯的力量』（斯達林）。『左』傾機會主義當然亦是這樣，『左』傾機會主義雖然有『左傾的』主義，雖然有小資產階級急進主義的一切特點，可是，在這次『左』右聯盟的事件裏面，更多一次的證明：『左』傾機會主義的根本意見是和右傾派有共同的深刻的機會主義實質的。

如果因為新發生的『左』右聯盟人數很少，只是些黨已經拋棄的人物，或者已經喪失了黨的一切信仰的人物，就認為這個兩面三刀的『左』右聯盟是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那就是很大的錯誤。雖然這一些智識份子反對黨的派別陰謀，沒有成功，而且是很可笑的，然而這些陰謀表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這個右傾機會主義是想阻滯和破

壞布爾塞維克的進攻的。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領導的右派和這個新聯盟之間有密切的聯繫，這難道不是很明顯的嗎？這個聯繫對於全黨都是很明顯的了。難道這個『左』右聯盟，不是在殘酷的階級鬥爭環境之中從右傾和『左』傾的『根源』裏產生出來的嗎？難道這個『左』右聯盟在黨內已經沒有暗藏的同盟者嗎？他的同盟者就是：對於右傾的調和主義，『左』傾的過火和對於這種過火的調和主義。他的擁護者就是：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用空談掩蓋自己的錯誤路線，甚至於自己也沒有認識自己的錯誤路線，客觀上這亦是兩面三刀的反對黨的。『左』右聯盟的同盟者——兩面三刀派，在有些地方黨部裏面，也已經揭發了。只要舉幾個例子就夠了：莫斯科第一車站的貨棧支部的事件，西部西伯利亞黨部裏面克利明夸，苦茲聶礎夫等的小團體和瘦草夫同志的極無原則的結合。蘇聯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極豐富的革命經驗，他的不調和性和精明能幹，真正是揭發和肅清一切機會主義份子的保障，一直肅清到那種『不一定的散漫的』機會主義份子，他們是『會永久避開確定的沒有轉灣的提出問題的方法，而滑頭滑腦的』（列甯）。

這樣，『左』右聯盟的機會主義的實質和他的意義，是由他的階級基礎，以及階級仇敵對於社會主義進攻猛烈反抗的程度來決定的。同樣，『左』右聯盟的政治上的意義和作用，決定於他的反對黨的派別工作，這種工作引導到破壞無產階級獨裁制，客觀上是

和階級仇敵反對無產階級獨裁的鬥爭聯合起來的。的確的，「左」右聯盟反對黨的列甫主義政策的兩面三刀的鬥爭，他的組織上的行動，客觀上都是幫助階級仇敵的。列甫城區域的黨部委員會關於「左」右聯盟的議決案，直接的說出他的階級本質，這真是布爾塞維克的實話——這個議決案說：『現在兩面三刀的手段是機會主義者攻擊黨的主要的假面具；對於這種兩面三刀的政策，必須實行最堅決的無情的鬭爭。右傾機會主義反對派和新的「左」右聯盟，是在執行階級仇敵的同一樣的使命。……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成爲吸引一切反蘇維埃力量的中心，而這些反蘇維埃的力量是在實行着推翻無產階級獨裁的鬥爭。在決定勝負的戰鬥環境之中，黨比任何時候都要更加有鐵一樣的團結和戰鬥的統一隊伍，自然，這個統一的基礎應當是列甫主義的政策。列甫說過：「誰要稍微削弱無產階級政黨的鐵的紀律（尤其是在獨裁的時候），他事實上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列甫的這句話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準確。而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受到這個教訓，他們重新又來企圖進攻黨的總路線和黨的列甫主義的領導』。

兩面三刀的手段是最叛變的手段，是黨內不能容忍的派別鬥爭的方法。現在階級鬥爭在兩個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正在決死的環境之中，機會主義派欺騙黨對着黨說謊話的策略，是要使他們自己轉到戰線的那一方面去的，不管他們自己願意不

願意，客觀上是要使他們在兩百萬的黨員之中處於仇敵的地位的，——怎麼那些機會主義的派別大家不看見這一點呢？

蘇聯有着一切條件，可以再往前進步，在社會主義的進攻之中得到勝利，在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的競爭裏面得到勝利。然而，要能夠勝利的往前進步，必須要有——一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使我們自己隊伍之中的機會主義份子孤立，這些機會主義份子妨害進攻，東歪西倒的儘在恐慌，而使黨內發生對於勝利沒有把握的心理』（斯達林）。我們的黨，從瘦草夫和洛明那慈聯盟的事件裏面，得到堅定的結論：使黨內右傾的『左』傾的機會主義者完全孤立起來，把事實上不肯拋棄機會主義觀點的人驅逐出黨，首先就是右傾份子。我們的任務是更加提高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尤其是反對現在階段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黨要特別用力去反對機會主義的一切種種的暗藏形式，反對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反對表面上的頌揚者，而無情的打擊一切兩面三刀派。

現在各地方黨部的決議，正是表示黨的布爾塞維克的精明，黨的不可侵犯的統一，黨爲着總路線鬥爭的不可動搖，他堅決的要停止右傾領袖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的那種不能容許的行動。現在各地黨部要求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答覆，並且要他們拿出證據來，證明他們是忠實於黨的路線的，——這不是偶然的事。右傾的領袖沒

以執行十六次大會的決議；他們沒有用理論上、政治上、實際工作上爲着黨的總路線的積極鬥爭，來證明自己承認錯誤的忠實。這些右傾領袖是不能夠不說話的；或者——事實上真正爲着黨的總路線而鬥爭，或者——黨就要根據十六次大會的決議而採取最嚴厲的辦法對付他們。

蘇聯共產黨莫斯科委員會的議決案說：『右傾反對派的以前的領袖（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不執行十六次大會的決定，不積極的爲着黨的總路線而鬥爭，這種行爲再也不能夠容許的了。莫斯科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會（Bureau of Moscow Committee）認爲中央委員布哈林，賴可夫，湯姆斯基的這種行動，應當由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來特別討論。蘇聯共產黨莫斯科委員會號召莫斯科區域的黨部的一切布爾塞維克，更加團結在列寧主義的中央的周圍，更加精明的審察，更加在反對『左』右機會主義者，反對兩面三刀派以及對於這些份子調和的調和派的鬥爭之中，表現思想上組織上的不調和的精神。』

蘇聯共產黨列寧城委員會『對於右傾反對派以前的領袖，要求他們拿出布爾塞維克的證據來，證明他們的確有決心實行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首先就是反對主要的右傾機會主義危險——反對機會主義的具體的表現者，反對兩面三刀派和黨的叛徒。』

西部西伯利亞黨部，亦『認爲布哈林的行動是他暗地裏實行着反對黨的鬥爭，等於

號召他的一派加多自己對於黨的兩面三刀的派別式的攻擊。黨部積極份子大會認為布哈林，頓可夫，湯姆斯基，對於新發生的兩面三刀的機會主義的活動所站的立場，等於和這種活動表示同情。黨部積極份子大會向中央機關提出一個要求：堅決的停止右傾反對派領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派別行動。

別的黨部的決定也是這樣的。這是黨的布爾塞維克的堅決意志。

蘇聯共產黨的這種絕不動搖的意志，中央委員會的列甯主義的領導，黨在兩條戰線圖爭裏面的布爾塞維克的不調和的精神，尤其是反對右傾，反對兩面三刀的手段，反對暗藏的調和的機會主義，——這是黨的力量，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力量，這種力量保障蘇聯在整個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進攻是能夠有勝利的發展的。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經濟的機關雜誌『布爾塞維克』第二十一期的社論）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